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4)上



修筑长城

我国的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它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据说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从月球上注视人类的摇篮——地球这颗星球时，所看到的只有蓝色的海洋和中国的逶迤曲折的长城。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那么长城建筑于何时呢？

长城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一直到明朝灭亡才停止。

长城的修筑，始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各诸侯国连年征战，烽火不绝，为了互相防御，便在自己的领土上修起一道或数道高大的城墙。因为它们是一条条状而不是周圈封闭的，所以称之为长城。

长城，起初先建彼此相望的烽火台或是连绵不断的防御城堡，然后用城墙把它们联系起来，便成了长城。烽火台起初是用来传递军情的。周幽王为了博得宠妃褒姒一笑，曾以烽火戏诸侯，正反映了用烽火来传递军情的情况。

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用以防御诸侯。随后，齐、燕、赵、秦、魏、韩、中山等国都修筑了互防长城。公元前4世纪前后，一些地处我国北部地区的诸侯，如燕、赵、秦等国，因和我国境内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匈奴毗邻。那时匈奴正处于奴隶制阶段，奴隶主贵族经常掠扰燕、赵、秦三国的领土，抢夺牲畜和人口，严重妨碍了那里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因此这三国都在北方修筑了防止东

胡、匈奴南掠的长城。这三国长城就是后来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基础。这些长城统称为先秦长城。

秦长城是秦昭王时修筑的，史称秦昭王长城。当时秦国国势日隆，厉兵秣马，力图东进，一统天下。可是强大的匈奴在西北虎视眈眈，匈奴贵族不时南下骚扰，对秦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安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严重影响了秦国掠夺中原、一统天下的计划。于是秦昭王决定打击匈奴，在甘泉地方击杀匈奴义渠戎王，然后乘胜追击义渠残部，占领了陇西、北地、上郡，开始修筑长城。秦长城起于今日岷县，经临洮，北达今兰州，再东行，到今宁夏的固原县，折而东北行，到甘肃的环县、庆阳，再到陕西的郿县、延安、绥德，止于黄河岸边。这一段长城即是后来秦始皇万里长城西部的一部分。

燕国也修筑了一条防御胡人的长城，这也是战国时出现的最后一条长城。关于这条长城的修筑，曾上演过一段著名的“苦肉计”。燕国受到的主要威胁是北面相邻的东胡山戎，燕国将军秦开擅长作战，无奈燕国弱小，只得答应东胡的要求，把名将秦开作为人质送给东胡，以求暂时的安宁。秦开到东胡后，很快获得了胡人的信任，并让他率军作战。秦开逐步摸清了东胡的情况，便寻机回到燕国，率军大举进攻东胡，大破之，逐东胡于1000里地之外。为防备东胡再度骚扰，燕国不仅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而且修筑了一条从张家口到辽阳的长城，长达2400余里。

赵武灵王是一个敢于革新和极力推进民族文化的君主。面对胡人侵扰，他冷静思考，不顾贵族官僚的反对，发布了“胡服骑射”的命令，引进了有利于生活和武备的胡人方式。经过整军经武，赵国开始反击，于武灵王二十年突出奇兵，打败了林胡、楼烦，二十六年又开发了燕、代、云中、九原等地，并修筑一条东起河北宣化，西至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缺口的长城，全长1300里，有效地阻遏了胡人的骚扰。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也曾利用赵长城的一部分作为基础。

秦、赵、燕三国长城的修筑，打下了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基础，形成了防御匈奴、东胡骑兵骚扰的屏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力，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人们通常认为我国的长城只有一万多公里，其实远远不止于此。根据历史记载，曾有 20 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长城的遗迹遍及中华大地、大江南北。今天在我国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 16 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古代长城、烽火台的遗迹。以内蒙古为多，境内长城竟达三万里，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的长度加起来，大约有 10 万里以上。

人们通常所称的万里长城是指明长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全长达 1.27 万多里，其中从山海关到鸭绿江这一段长城，由于工程比较简单，毁坏较为严重。而从山海关到嘉峪关这一段工程较为坚固，保存较为完整，有两个关城，东西对峙。所以长期以来就被一般人误称之为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了。

秦长城东起辽东，西到临洮，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万里长城，它是秦始皇时修建的。

秦始皇，姓嬴，名政，是我国历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帝王之一。公元前 221 年，他凭借强大的武力，以席卷千里之势，用短短的 10 年时间兼并了六国，结束了战国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他觉得自己的功绩比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还要大，不能再用“王”的称号，就应该用一个更加尊贵的称号才配得上他的功绩，就决定采用了“皇帝”的称号。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就自称是始皇帝。他还规定：子孙接替他皇位的按照次序排列，第二代叫二世皇帝，第三代叫三世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传到千世万世。

全国统一了，那么该怎样来治理这样大的国家呢？

在一次朝会上，丞相王绾等对秦始皇说：“现在诸侯刚刚消灭，特别是燕、楚、齐三国离咸阳很远，不在那里封几个王不行，请皇上把几位皇子封到那里去。”

秦始皇要大臣议论一下，许多大臣都赞成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反对。他说：“周武王建立周朝的时候，封了不少诸侯，到后来，像冤家一样互相残杀，周天子也没法禁止。可见分封的办法不好，不如在全国设立郡县。”

李斯的意见正合秦始皇的心意。于是他决定废除分封的办法，改用郡县制，把全国分为 36 个郡，郡下面再分县。郡的长官由朝廷直接任命。国家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皇帝决定。据说秦始皇每天看下面送来的奏章，要看 120 斤竹简（那时的奏章都是刻在竹简上的），不看完不休息，可见他的权力是多么集中了。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向来是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就拿交通来说，各地的车辆大小就不一样，因而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从那时候起，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叫做“车同轨”。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的文字也很不统一。就是一样的文字，也有好几种写法。从那时候起，采用了比较方便的书法，规定了统一的文字。从此，各地的文化交流也方便多了。这叫做“书同文”。

各地交通便利，商业也发达起来，但是原来列国的尺寸、升斗、斤两的标准全不一样。从那时候起，又规定了全国用统一的度量衡制。这样，各地的买卖交换也没有困难了。

秦始皇正在从事国内的改革，没想到北方的匈奴打了进来。匈奴本来是我国北部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到了战国后期，匈奴贵族趁北方的燕国、赵国衰落，一步步向南侵犯，把黄河河套一带大片土地夺了过去。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就派大将蒙恬带领 30 万大军去抵抗，把河套一带地区都收了回来，设置了 44 个县。

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称之为淳维，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游牧为生。他们逐水草四处迁徙，没有常年居住的城郭，也不从事农业生产。匈奴当时尚没有文字，少儿即能骑羊，引弓射鸟鼠，稍年长就能射杀狐兔。“士力能弯弓，尽力甲骑。”在草丰畜肥的时候，匈奴人猎取动物生活，穷迫了就向外攻伐，大肆侵掠。有利则进，无则退，并不以逃跑为耻。遇败四遁，忽而又啸聚一团。匈奴的首领号称单于。单于经常带着匈奴骑兵向南骚扰，抢掠粮食和其他财物。他们在战国时代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他们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畜养着马、牛、羊、骆驼、驴、骡等牲畜。他们吃牛羊肉，喝牛羊马奶，穿羊皮衣，住毡制的帐篷；善于骑马射箭，性格强悍。大约在周朝末期，他们从氏族社会过渡到了奴隶制社会。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并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然而北方匈奴骑兵的骚扰严重威胁着秦王朝的安全，为了保卫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防止匈奴骑兵的袭扰，秦始皇意欲进攻匈奴。这时有一个燕地的方士，史称卢生，刚从海上求仙回来，揣摩到秦始皇的意图，“以鬼神事”，进奏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遂假方士之口，立即派大将军蒙恬并以太子扶苏为监军，率领 30 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南地，设置了 44 个县。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便是《史记》对此事的记载。其时秦军力正盛，又派蒙恬率领精锐之旅，北渡黄河，追击匈奴军，势如破竹，连克高阙、陶山、北假中。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在此时期，匈奴单于无力打败秦军，于是北迁。十余年不敢南下而牧马，然而仍然威胁着秦朝北方各地边郡。

为了有效地阻遏匈奴骑兵的南袭，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征发囚徒，开始修筑万里长城。长城延袤万余里，东起辽东，西至临洮，因而工程量十分惊人。长城经行的地理情况千变万化，高山峻岭、大河深谷、沙漠草原、戈壁滩石等等都有长城穿越，这又增加了长城的建造难度和建造量，因此秦始皇调来大量劳力修筑长城。

修筑长城的人力来源，大约有如下几方面：第一是戍防的军队，这是修筑长城的主要力量。大将军蒙恬在打退匈奴之后，以 30 万大军防匈奴，同时加紧修筑长城，直到秦二世赐蒙恬、扶苏死，花了九年时间才筑成。不过《淮南子·人间训》中记叙：“秦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虽则人数与《史记》记载有所不同，可是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军队是修长城的重要劳动力来源。第二是强迫征调的民夫，这是修筑长城的重要力量。秦始皇时除所派蒙恬率领的几十万军队之外，还强征了大量的民夫，约有 50 万左右。秦朝当时全国人口约 2000 万左右，男劳力仅 500

万，可秦始皇却征发近百万人修筑长城，全国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全国各地怨声载道。第三是发配充军的犯人。在秦朝，专门有一种刑罚叫城旦，就是罚去修长城的人。据《史记》记载：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下“焚书令”，令下 30 日后，凡抗拒不烧书者，一律在脸部刺字，剃了头，颈上加上铁圈，送去修长城，为期四年。白天轮流看守巡逻，夜间则修筑长城，许多人不堪劳累而死。除此之外，秦始皇还巧立名目，强迫老百姓去修筑长城。

长城上的一砖一瓦一土一石都浸透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工匠们劳动十分艰苦，所以在修筑的过程中，死了不少人。被征集来的成千上万的民工，风里来，雨里去，肩膀压肿了，腿脚摔坏了，在监工的鞭打下，没日没夜，流血流汗地干活，许多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滴汗，惨死在长城脚下。

一千多年来，不少诗人用诗词歌谣等形式，揭示了劳动人民对奴役筑城的愤怨。汉朝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诗中写道：“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不独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历史上不少人以此来斥责秦始皇无道，并借一个早于秦始皇多年的“杞梁妻”的史实，编造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故事梗概是：陕西同官有女名孟姜女，丈夫范杞良（或叫万喜良）因拒不焚书，定了“城旦”之罪，在新婚之夜被抓去修长城。万喜良一去几年，孟姜女在家里眼巴巴地盼望着丈夫回来，可总是毫无音信。后来她等急了，怕丈夫受不了北方的寒冷，就做了棉衣，打成一个包袱，背着它，离开家乡，路远迢迢地到长城工地上去给丈夫送棉衣，孟姜女一路上鸡鸣赶路，日落投宿，跋山涉水，含辛茹苦地赶到了长城脚下。可是她只看到了望不到头、高不可攀的长城，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丈夫已经死去，和其他为修长城而累死的人一起埋在长城底下了。孟姜女十分悲哀，在长城脚下痛哭了起来，直哭得天愁地惨，狂风怒号，黑云压顶，积雪变色。忽然间，只听得豁啦啦一声巨响，像天崩地裂，孟姜女把长城哭倒了 800 里。

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劳役太重，死人太多，所以就有孟姜女寻夫哭长城的民间故事流传下来。

在山海关建有孟姜女庙，其实秦始皇长城距山海关尚有数百里之遥，而且杞梁妻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是春秋时候的事，远在秦始皇之前。但是将这个故事加在秦始皇头上，多少反映了他在使民力上过多而造成的恶劣影响及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长城，横亘在我国的北方大地上，它气势雄伟，历史上一直是中原王朝阻挡北方蒙古草原上勇猛强悍的游牧民族进攻的一道天然屏障。今天，它又以世界奇迹的姿态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当我们登上长城，看到它宛如长龙奔驰在丛山峻岭之间的时候，一种惊叹赞赏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秦时的长城沿线，不是高山深谷，就是沙漠草原，又没有先进的施工机具和运输工具，施工之难可想而知，然而，我国劳动人民以其勤劳和智慧，完成了这艰巨的工程。

“因地形，以险制塞”，是劳动人民从实践中创造的一条宝贵经验，在秦始皇时已经把它肯定下来，并成为以后历朝修筑长城时遵循的一项原则。试想，假如不利用高山险阻修筑城墙，那将花费出许多倍的人力与材料。如果不利用大河深谷作为屏障，而是平地筑墙，所费人力物力更无法计算。万里长城凡是修筑关隘的地方，不是两山之间的峡口就是河谷会合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道。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与材料。至于修

筑烽火台、堡子等则是更需仔细选择地形，因地制宜而建。烽火台一般建在高山之上，或孤旷的地方。四面都便于看的到，至于修筑城墙利用地形，则比比皆是。许多地方的城墙都是沿着山脊的脊背修筑，因为山脊本身就好像一道大墙，再在山脊上修筑城墙就更加险峻了。而且在修筑时更注意到利用山脊的崖壁来修筑城墙。有的地段从外侧看去非常陡险，但里侧却较平缓，因外侧是御敌而内侧则是防守士卒上下的。有的山脊外侧巨石悬崖，本身即可防御，长城修到这种地方即利用原来的悬崖巨石或陡坎险坡稍加修筑平整即成险阻。在十分高峰的悬崖的地方，长城到此也就中断了，因为像这样的悬崖是不可能上人的，用不着修城墙了。总之，使它能够达到防御的目的就可以了。

秦代修筑长城的时候，还没有大量用砖，主要建筑材料是土石和木料、瓦件等。因为工程浩繁，需用土、石量很大，一般都就地取材。在高山峻岭的地方，就在山上开取石料，用石块砌筑，在平原黄土地带便就地取土，夯筑成城。

运输也是修筑长城中的一个难题，把大量的土方、石灰、大条石、大城砖运上山去，不仅在秦代，即使在现代也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为此，秦代能工巧匠们想出了许多办法。根据记载和传说，搬运建筑材料上山的方法大约有如下几种：

（一）人力搬运。这种方法是最原始的方法，用人背、肩扛、筐挑、杠子抬等方法把大量的城砖、石灰、石块搬运到山岭上去。当时，人们还采用了传递的方法，把人排成长队，从山脚下或已修好的部分城墙排到山脊上，依次把城砖和小石块一块块传递上去。这样运输的优点是减少来回跑路。特别是山路狭窄，可以减少来回的人互相碰撞，提高运输的效率。

（二）简单的机具运输。除了人力的运送之处，当时就已经利用了简单的机具，如像手推小车，这是在比较平缓的山坡之上使用的。修筑关城和堡子等平地建筑时就更多地利用推车。在运送上千斤的大石上山时还采用了滚木和撬棍，并且在山上安装绞盘把巨大石块绞上山脊去。在跨过深沟狭谷运送砖瓦和石灰时，还采用了“飞筐走索”的办法。即把砖瓦石灰装在筐内从两岸拉固的绳索上滑溜过去，大大地节约了劳力。

（三）利用动物运输。传说在八达岭高山之上修筑长城的时候，曾经利用过善于爬山的动物山羊和毛驴。把筐内盛满石灰，然后将筐跨在毛驴背上，把毛驴赶上山去；在山羊角上系上城砖，然后把山羊哄上山去，以此代替人力运输。总之想尽了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条件来修筑长城。

秦长城西达临洮，现在临洮还保存着一段秦代长城的遗迹。从秦代临洮长城的遗迹看，我们可以了解秦代长城的规模和特征。

临洮位于甘肃省的南部的洮河岸边。沿着洮河是一片肥田沃土，宜于农牧业的发展，所以，很久以来这里就成了人民居住生活的地方。驰名中外的原始社会的遗址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即分布在洮河的沿岸。史书上说：临洮在春秋战国时属雍州，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这里属陇西郡，汉朝又设置狄道县，并且成为陇西郡治的所在地，晋惠帝时改为狄道郡，唐朝初年属兰州，唐肃宗乾元初年改为临洮州郡治，清初称为临洮府治。

临洮地区虽然古迹遍地，颇具浓郁的塞外风情，然而，目前来这里观光的游客还不多。不过这就更使那些有幸前来的旅行者带有先睹为快的兴奋之

情和探险家的自豪感。然而，来此地进行考察的中外历史学家和调查古典建筑遗址的建筑家，以及专以走前人未开之路的探险家，倒是接踵而至。

专家们打开古书告诉我们，历代以来临洮都是封建王朝的地方政治军事据点之一。司马迁的《史记》上就说：公元前 221 年，始皇统一天下后，到公元前 214 年，派名将蒙恬领兵 30 万击败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建立了 44 个县，还增筑长城，从临洮修起，延袤万里，远达辽东。

专家们考证，秦代的长城，就是经现在临洮的东面山下，沿着洮河而西达于岷县的。今日的游客还可以在长城坡长城遗址处看到这座实物例证。

长城坡秦长城在今临洮县城的东面。对古代建筑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在此仔细研究我国两千年前祖先所建造的建筑奇观。出县城西门有一条小河名叫东峪沟，《水经注》上说，这条小河就是古时的滥水，即陇水。沿东峪沟溯流而上，行 50 里即可到达窑店驿。但见此地形险隘，两旁高山夹峙，东南是通渭南的大道，东北可通陇西各地，正是古代军事驿传的重要地点。长城即跨于沟的两面高山之上，好不雄伟庄严。然而在两千年前在这缺砖少石的荒地之中怎样修起的这惊世的建筑呢？我们聪明的祖先巧妙地采用了夯筑的方法，建造了这一奇迹。在窑店驿东北有一个 400 多米高的山坡，被称为长城坡，登上坡顶，可看到一段 400 多米的保存比较完好的长城。看着它的雄姿有的游客会问，这真是两千年前的人所修建吗？秦朝的建筑居然还能保存至今？对于这个问题，专家们为我们作出了科学的论证。

第一、城墙的夯筑方法与以后明代长城不同，从建筑技术历史分析，属于秦汉时期的夯筑方法。

第二、在长城口所发现的板瓦、陶管等都是秦代或战国的风格，而这些遗物绝非是此地居民所留下的。因为在这高山之上过去很难有居民居住，即使有人居住过也不会有这样大的板瓦、陶管等建筑构件。

第三、从建筑施工方法上看，属于秦汉一类，但汉长城远在临洮之北，因此不是汉代所修筑。

第四、汉代以后所有王朝都是把政治军事据点的郡、州、府、县的治所设在今临洮的位置，而长城是决不会在其内修筑的。因此，也不会是汉以后所修筑的长城。

据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完全是秦代的长城遗址。

秦始皇大修长城，激起民愤，成为秦朝灭亡的主因之一。但到了汉代，不仅修缮了秦长城，而且修筑了外长城，它们的长度达到了两万里，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

汉朝修筑长城实际是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继续，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防御匈奴。西汉初年，匈奴单于冒顿侵霸了友邻部落，并趁秦陷于内战，重占了河南地，势力渐大，冒顿多次南侵。面对这种威胁，汉统治者在抗击的同时，着手修缮秦长城。到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兵，开始新筑长城。汉武帝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修筑了两千多里长的河西长城。为了抗击匈奴的掠扰，发展西域诸属国的生产，保护通往西方的交通干道，汉武帝又在敦煌、楼兰修筑了列城、烽燧。

从此以后，汉统治者也修筑了一些长城，但远不及汉武帝时规模大。

在汉以后的历朝历代中，除唐、宋、辽之外，几乎都修过长城，但规模都不大，唯有到了明朝，才又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在明朝二百多年中，差

不多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长城的防务。明朝长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更大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万里长城这个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经秦始皇连成一气的伟大工程，到明朝才完成的。

为了加强长城的防务和指挥调遣长城沿线的兵力，明朝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守区——镇，形成了一道保卫中原地区的非常有力的屏障。但是由于明朝末年吴三桂“引狼入室”，长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就被攻破。到了清康熙的时候，随着清王朝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统治策略的改变，才决定不再修长城，明朝成了最后一个修筑长城的朝代。长城除个别地点之外，从此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

万里长城的修筑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两千多年来，众说纷坛，有褒有贬，各抒己见。汉朝的贤良唐生、贾谊、司马迁，唐朝的贯休，宋朝的郑震等人都对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加以贬斥。他们斥责秦始皇为政暴虐，滥用民力，修筑长城，劳民伤财，贻害百姓。唐朝的贯休还作了一首《杞梁妻》诗斥责秦始皇，诗中写道：“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扭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清朝的康熙皇帝玄烨到东海巡视时也写了一首诗，批评秦始皇修长城，虽然工程浩大，费尽了民力，可是仍然没有保住天下。诗中写道：

万里经营到海涯，
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时费尽生民力，
天下何曾属尔家。

确实，秦始皇暴虐无道，滥用民力，结果导致了农民起义，秦王朝也因此宣告覆灭。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秦始皇修长城的积极意义，否则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自战国以后，长城的修筑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

实际上长城对我国历史的发展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它的首要作用是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入侵，随着工程的修筑和设防的需要，长城对于我国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保障中西交通等方面，都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在历史上褒扬秦始皇的也不乏其人，如汉文帝、桑弘羊、唐太宗、杜甫等，他们认为要保卫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安定，必须备战设防，修筑万里长城是非常必要的。桑弘羊说：“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堡而御强暴也……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故蒙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道理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是根据巩固

中央集权封建制统一国家的需要所采取的一种政治军事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秦始皇的确滥用民力，全国劳力不到 1000 万，丁男劳力仅 500 万左右，而他一年就役使了 300 万人，故而激起了民变。但修筑万里长城并不是秦朝灭亡的主要因素，也不能因此而抹煞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功绩。在古代凡

是用刀枪、剑戟、弓弩等兵器作战的时候，高大的城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障碍，对于骑兵部队则更是麻烦，到此不得不驻马不前。再加上军队的把守，那就更难逾越了。纵有兵力实施强攻，也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和较长的时间。这时，防守的一方就可以在敌人进攻的时候，争取时间，调集兵力，予以抗御。总之，长城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

当时的长江、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处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社会阶段，农业生产需要安定经营，长期培植，才能获得好收成。而当时的匈奴、东胡还处于奴隶制的早期阶段，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对于这些飘忽无定的游骑，如果派许多大部队追击，他们就远走。一旦大军后撤以后，他们又聚成一团，返回来骚扰北方边郡，从而对当地的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假如没有城墙的阻挡，匈奴铁骑就可以任意出入，因此必须修筑长城，方能有效地遏止胡骑的袭扰，保护农牧业生产。即使秦始皇不修筑万里长城，他以后的统治者也不得不修筑。汉朝的晁错对此说的很清楚。他说：“胡人……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在胡骑乘虚而入之时，如果朝廷不发兵救援，那么边地老百姓就会对朝廷产生绝望之情，而生归附胡狄之心。如果派兵去救援，军队少了就显得不够用，如果多了，好不容易赶到，胡骑却已撤走。大军驻扎在边境，费用十分大，如果撤回内地，那么胡骑又重新进行骚扰。“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因而他提出最好的办法还是高城深堑，发卒以治塞，修长城，立关险，设城邑，才能解决胡人的袭扰。

以后历朝历代，除唐之外，遇北方游牧民族袭扰时，都采用了修长城的办法。直至明朝仍有人提议修筑长城，理由是：“胡人以游牧为生，骑射为业，侵暴边境，出没无常，大举深入，动至数万，历代以来，屯兵成守，寡则艰于应敌，多则困于运输。是故虏众易合，而势常强，我兵难聚，而势常弱。”

由此可见，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是形势所迫，不能以此作为攻击秦始皇的理由。秦始皇固然暴虐，可是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严刑酷法是无法在九年之内完成这么宏大的工程的。在汉武帝时，修长城耗尽了数十年积累的财富，但没有人指责汉武帝修长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秦始皇给他打下基础的缘故。我们不能认为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是错误决策，就像隋炀帝挖大运河一样。

秦朝的灭亡，主要是由于当时秦朝社会矛盾的激化引起的，特别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秦始皇统治的晚期已经变得相当尖锐。

农民阶级是秦朝担负社会生产的主要阶级，秦朝的大地主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秦国的贵族地主、国君和皇室，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享有特权。此外，有些大官僚、大将军因战功或其他功劳，按军功爵授予土地，也成为大地主，他们共同操纵着秦朝的政治大权。秦王朝的统治，就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榨基础之上的。农民阶级的地位和生活状况稳定与否，是秦朝统治能否巩固的关键。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由于大量而频繁的劳役与兵役，大量劳力脱离生产，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民大批破产，最后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走上了反抗之路。因此虽然修建长城并不是秦灭亡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但是它对农民的正常生活与生产确实也起着消极的影响。所以，秦始皇为巩固统一，修筑长城势所必然，但其选择的时机与修筑的规模却是不太适当的。

光辉灿烂的楚文化

据文献记载，最初在商朝时期，楚国就已经建立了。楚国文明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历时最长的政权之一。

春秋初期，楚国开始强大之后，长期进行对外征服扩张，接连不断地对四周的邻国用武，吞并了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还兼并了许多诸侯国的附庸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春秋时期，楚国大约灭掉了40多个小国。到了战国时期，又灭掉了8国，从而大大扩大了自己的领土。楚国疆域最大时，占有今天的湖北全省，还包括陕西、四川、河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一部分地区。那时，楚国是东周列国中最强大的一个诸侯国，实际上占有当时天下的一半。楚国可以说是地大物博，国力强盛。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称霸争雄的基本条件，也是光辉灿烂的楚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

原来，南方地广人稀，土壤肥沃，而且气候温和，雨量充足，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楚族从北方向南方迁移时，带来了北方的农业技术，又继承了江汉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原始农业的生产经验。当时，重要的生产工具是耒耜。耒耜相传是神农氏发明的，上面有长柄的叫耒，下面有铲的叫耜，用来翻土耕地。到了春秋中晚期，楚国掌握

了冶铁技术，成为比较早地使用铁农具的国家。到战国时期，铁农具已经相当普遍地用于农业生产。楚国是东周时期冶铁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最著名的冶铁中心是宛城。

有了铁器之后，楚国逐渐使用和推广了用牛耕田的方法，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由于水稻种植的需要，楚国十分重视修建水利设施。孙叔敖主持修建了期思陂。战国时期，楚国又在淮南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芍陂，可灌溉上万亩农田。楚国的提水工具也大有改进。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到过楚国。他离开楚国到晋国去，路过汉水以南的时候，看见一位老农在菜园里劳动，抱着一个瓦瓮从隧道中提水浇地，很费气力。子贡建议他架设桔（古代的一种提水工具，也叫吊杆。用一根横木支系在木柱上，一端用绳吊一水桶，另一端系一块大石头或者其他的重东西，使两端上下，来提取井水）。老农说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意那样做。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春秋晚期，楚国已经比较早地使用这种用力小而功效大的工具了。

楚国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因地制宜，发展了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当时，楚国生产的重要粮食作物有稻、麦、粟等，重要的副业有养羊、养蚕、缫丝、酿酒等。

西周初年，楚国比起当时的齐、鲁等中原大国来说，是非常落后的。以后，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楚国大量开发境内蕴藏丰富的铜、锡等矿产资源，又广泛吸收了商、周文化，于是，楚国的青铜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生产了大量的青铜礼器、武器、工具等。楚国有军队百万人，按每人需要一公斤的青铜武器计算，就需要一千吨青铜原料。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了曾侯乙墓，该墓出土的全部铜器，用铜总量达10吨以上。从这座墓葬大致看出当时楚国的经济与文化成就。

楚国青铜器的铸造方法，继承了中原地区从商朝以来流行的分铸法，还有浑铸与分铸混合使用的方法。1980年，在河南淅川发掘了楚国令尹子庚墓，出土了一件铜禁，长1.07米，宽0.4米，全部由三层铜梗组成。里层铜

梗比较粗，作骨架起支撑作用。中层铜梗多呈拱状。外层铜梗较细，卷曲盘旋在外，表面有卷草状花纹。禁壁还附有 12 个怪兽，仰头扬尾凹腰，头上有镂空泡形器作角。下面有虎形禁脚 10 个，也是仰头扬尾凹腰，造型别致、逼真。整个铜禁结构复杂，花纹繁多，表现出这时楚国的青铜器，在造型和纹饰方面已经和商、周时呆板、庄严、肃穆的风格完全不同，趋向于生动写实的现实主义手法。这件铜禁使用了失腊铸造法，是我国最早使用失腊铸造法的铸器，比古代印度还早得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在铁和钢的冶炼方面，楚国的技术也很高超。铁的

熔点比铜高得多，人类历史上先有铜器而后才有铁器。楚国冶铁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使用的是块炼法。把铁矿石和木炭一层夹一层地从炉上面加进去，但因温度不够高，去了氧的铁成了海绵似的熟铁块，经过反复敲打，敲掉杂质就成了熟铁用具。后来，又使用皮囊鼓风，提高了炼铁炉的温度，铁矿石熔化为铁水，用翻砂方法铸成各种东西，叫做铸铁。欧洲直到 14 世纪才使用水力鼓风机，才发明了铸铁技术，比我国晚了一千多年。

到春秋晚期，楚国又发明了渗碳炼钢技术。铁和钢都是铁和碳的合金，区别在于含碳量的不同。炼钢时，在熟铁周围装上碳，燃烧时让碳渗进铁的表层，再把铁拿出来锻打。再烧再打，反复多次，使碳均匀地分布在铁里面，并去掉许多杂质，叫做百炼钢。这种钢表面硬度高，而且韧性好，所以，造剑多用这种钢，既能使刃口锋利，又不易折断。1976 年在湖南长沙春秋晚期的一座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把钢剑，长 38.4 厘米，宽 2 - 2.6 厘米。从剑身中部断面可见，它是由七到九层叠打而成，取样化验分析为含碳量 0.5% 左右的中碳钢，并经过热处理。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把钢剑。

由于楚国人民的辛勤劳动，楚国的丝织业发展迅速，成为农业的主要家庭副业。官府也设立了丝织作坊。湖南长沙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方印玺，上用阴文刻着“中织室钺”，是掌管宫廷纺织事务的官的印玺，可见楚王宫廷设有专管纺织的机构。

在纺织业中，楚国最发达的是丝织业。春秋时期，楚国的种桑养蚕缫丝已很普遍。1982 年，在湖北江陵的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最引人注目的有大幅面龙凤纹绣绢、神兽纹织绵、龙虎纹绣罗、蝉翼轻纱、花鸟细涤、锦面麻鞋、帛画、绣衣木俑、还有轻盈华丽的各种衣着，上面神奇对称的纹饰，好像天空中的彩霞，地上的鲜花。这些丝绸在地下埋藏了两千三百多年，出土时仍然色泽鲜艳、灿烂夺目。

这座楚墓中用九道锦带捆住的两条锦衾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大幅战国锦衾，有许多新的特点，一是花纹大，二是幅面宽。有一条长 3.49 米，宽 1.94 米，衾里用四条白绢缝合，面是咖啡色。三是图案美，有对称的龙凤、舞人、神兽、花鸟、太阳等。四是织造精，如织造提花的对称舞人，高举衣袖，移动双脚，轻歌曼舞，妩媚动人。有些兽鸟，连凤毛麟角和动作神态都清晰可见。五是色泽鲜，主要有朱砂红、茄紫、深赭、浅绿、茶褐、金黄、棕黄、绛红、粉红等，五光十色，十分谐调，非常好看。

髹漆业是春秋时期兴起的手工业，以楚国的漆器最为有名。湖南长沙等地的楚墓中出土的漆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优美，色彩艳丽，花纹流畅，自成风格，大大超过了其他诸侯国同类产品的水平。战国时期楚国漆器发展更快。湖北江陵出土的彩绘卧鹿，体态是盘脚静卧，头却高高抬起，两眼警觉地凝视远方，好像发现了敌情，形象栩栩如生，充分表现了楚国髹漆艺术

的成就。

我国天文历法的历史悠久而发达。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最发达的诸侯国之一。楚国官职中设有太史和卜尹，他们都负有观察星象、研究天文的职责。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帛书，包括先秦的许多著作，其中有一部《天文气象杂占》，成书于战国时期，该书以象征十四国的云气开头，说“楚云，如云而白”，列为第一，然后列举了赵、中山、燕、秦等十三国的云气，大致从北方开始，从西北向东南，按一定的地理位置秩序排列。该书的作者估计是楚国人。书中还记载了任氏、北宫等有关天文方面的论述，这些人大约也是楚国的天文学家。该书还绘有250幅云、气、彗星、恒星等图象，其中有29幅各种形状的彗星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

甘德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著名天文学家。甘德长期观察研究天象，曾经系统地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规律，精密地记录了黄道附近的恒星158座、511颗的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编成恒星表，还写有《岁星经》和《天文星占》两部天文著作。后来，人们把《天文星占》与战国时期魏国著名天文学家石申的《天文》，合成一书，名叫《甘石星经》，也叫《甘石星表》，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份恒星表。

甘德观察到木星很大并且有光，好像有小赤星在它旁边。小赤星也就是木星的第三号卫星。根据现代观察，木卫三呈橙黄色，古代的“赤”指浅红色，颜色基本一致。据推算，甘德发现木卫三的年代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360年之间，最可能的时间在公元前364年夏天，当木星正在宝瓶座运行的时候。世界天文学界认为木星的四大卫星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和德国天文学家麦依耳最早发现的。事实上，甘德比他们要早1970多年。

甘德、石申的著作中还有关于28宿的记载。28宿对于划分天区、测定日、月、五星与恒星的位置以及运行规律、编制历法，都有重要作用。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曾侯乙墓时，发现了一个漆箱。盖面黑漆，底色上绘红彩，中间用粗笔写着一个篆文的大“斗”字，绕“斗”字一圈，用篆文写着28宿的古代名称。盖面一端绘青龙，一端绘白虎，四角有“回”型图案。这一重要发现，充分证明《甘石星经》中关于28宿的记载是可靠的。

战国时期，楚国已经采用《四分历》作历法，规定一回归年等于365.25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与古代罗马统帅儒略·恺撒在公元前46年采用的历法天数相同，但《四分历》比《儒略历》早300多年。《四分历》还规定一朔望月等于 $\frac{499}{940}$ 日，在19年中插进七个闰月。《四分历》还把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这对农业生产很有利。

楚国的文学艺术也很发展。宋玉，比屈原稍晚，以擅长辞赋著名，作品有16篇，《九辩》是人们所公认的。宋玉的骚体诗，继承和发展了屈原的浪漫主义手法，采用了楚国的许多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给以提炼和加工，创造了许多具有巨大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从形式上看，他发展了楚辞，成为一代新的文学形式汉赋的开创者。不过，这种赋也导致了着意讲究辞藻、单纯追求形式美的风气的产生。

音乐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随着生产发展和文化的发展而逐渐繁荣。春秋时期，我国的音乐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有东南西北四方之音，其中南音包括楚音、吴音和越音。楚国是以音

乐和舞蹈之邦而享有盛名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疆域的不断扩大，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音乐发展很快。

西汉时期的刘向在《新序》中记载了宋玉回答楚王的一段故事：“有个人在楚国都城郢中演唱，开始唱的是《下里巴人》，都城中跟着他唱的有好几千人。后来唱《阳陵采薇》，跟着唱的人有几百人，再后来演唱《阳春白雪》，都城中跟着唱的不过几个人。”《下里巴人》尽管是楚国的民间歌曲，但在郢都一个城市里，能够跟着唱的，居然有几千人之多，可见楚国音乐的普及程度是很高的。还有《阳春白雪》等比较高深的歌曲，可见楚国音乐的发展程度。

楚国还有一整套的高级乐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有乐器 124 件，不但品种多，数量大，而且按照演出实况悬挂陈列，井然有序，场面十分宏伟壮观。如果说长沙的马山楚墓是一座丝绸宝库的话，随县的曾侯乙墓简直可以说一座地下音乐厅，难怪有些外国专家把它誉为“古代世界第八奇迹”。

乐器中有编钟 64 件，包括纽钟 19 件，角钟 45 件，还有缚钟一件。出土时分三层悬挂在钟架上，最大的一件角钟高 153.4 厘米，重 203.6 公斤，形体和重量都超过了以前出土的同类文物，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庞大的乐器。整套编钟花纹纤细，形体美观，没有铸造方面的任何缺陷。

钟架为铜木结构，分上、中、下三层，是曲尺形，正架长 7.48 米，高 2.65 米，侧架长 3.85 米，高 2.73 米。横梁是木质，刻满彩绘花纹，两端套着浮雕或透雕的青铜套，作为装饰并起加固作用。中、下层横梁分别由三个佩剑铜人用双手或头承顶着，下层铜人站在大型雕花铜座上。整个钟架结构牢固，虽然承受了五千多斤的重量，在地下经历了两千多年，仍完好无损，和以前一样。旁边有六个丁字形木槌和两根细长木棍，供演奏者用。

每件钟上都有关于音乐方面的错金篆体铭文，总共有 2800 多字，并在鼓部与隧部标有音阶名称，只要准确地敲击标音部位，就能发出符合铭文的乐音，特别是每件钟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而且音域宽广，可达到五个半八度。中层角钟是主要部分，音域是三个半八度音阶。下层角钟体大壁厚，声音深沉宏亮，可以作和声，烘托气氛。上层纽钟可能主要是定调的。编钟十二个半音兼有，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多种乐曲。经过测试，这套编钟至今演奏起来，仍然音乐优美，和谐动听。

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的这批稀世珍宝，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我国已经成功地制成了编钟的部分复制品。复制品确实达到了原件的音响效果，高音区清脆、明亮、悠扬，低音区浑厚、深沉、气势磅礴。它既奏出了如歌的旋律，又在伴奏和伴唱时，发挥了铿锵轰鸣的效果，甚至站在十几米以外，也能感到空气的振荡，这都是别的乐器所无法达到的。编钟不但能演奏我国的古令名曲如《胡笳十八拍》、《满江红》、《梅花三弄》、《浏阳河》、《洪湖水、浪打浪》等，而且也能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旋律，《一路平安》等外国名曲。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各种用具、武器、礼器、建筑物上，往往绘以各种图画作为装饰，增加美感。例如，纪南城南垣水门外曾出土彩绘编磬 25 具，画面布局疏密有致，笔法活泼流畅，是音乐和艺术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不可多得的珍品。

楚国还流行在丝织品上绘画，这种画称为帛画。在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

出土了三幅帛画，其中一幅四周画着奇异的动植物图像，中间写有文字，其中许多字至今还无法认识。另外两幅，一幅是《人物御龙帛画》，1973年出土于长沙城东子弹库的楚墓中，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面有一位神态刚毅的中年男子，身材修长，头戴高冠，身穿广袖长袍，腰佩长剑，手挽缰绳，站在蛟龙身上。蛟龙头高昂，身平伏，尾上翘，有如龙舟。龙尾巴上还站着一只扬头的仙鹤，龙的左下角，还有一条鲤鱼在游动。蛟龙乘浪腾水，人物头顶上的华盖缨络迎风吹拂。看来，人物正升在云烟缥缈的广阔无际的天空。这是一幅描绘墓主人的御龙升天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出之作。

另一幅是《人物龙凤帛画》，1949年2月出土于长沙东郊陈家大山的楚墓中，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面构图分上、中、下三层。主体是中层的妇女，她站在下层的大地上，侧身面向左上方的龙凤站立，身穿宽袖细腰拖地的长袍，双手合一，面部表情肃穆、虔诚。上层的天空中，左边有龙，头朝上，长着双眼，身躯细长弯曲，两侧各有一脚，尾端卷曲，作扶摇直上之状，妖娇上飞，生动有力。右边有凤，圆目长嘴，昂首仰天，苍劲刚直，两足奋力，展翅飞腾，龙凤紧相呼应，并且和妇人声息相通。

这两幅帛画尽管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却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帛画，在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这两幅画都是楚国画家所作，这就充分反映了古代楚国高度发达的绘画艺术水平。

雕刻，楚国这项古老的艺术到春秋战国时期更加焕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楚国雕刻艺术中发展最突出的是木雕。楚国木雕艺术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彩绘木雕座屏。该屏1965年出土于江陵纪南城西望山一号楚墓。屏高15厘米，宽51.8厘米，屏面厚3厘米。屏面由镂空透雕的凤、鸾、鹿、蛇等27个动物组成，中部有双凤共衔一蛇，双爪抓二蛇，左右两半对称，各以嘴、爪制伏两条蛇的鸾鸟为中心，这两条蛇盘作一团，分别咬住鸾鸟两边奔跑的梅花鹿的前上肢，底座是浮雕，有大蛇、青蛙等24个动物。整个画面，表现出凤鸾为保护遭受侵害的梅花鹿，正奋力与恶蛇拼搏。恶蛇被强敌袭击，已缩成一团，面临失败。这幅画充分反映出楚国人民爱护善良、驱灭邪恶的崇高精神境界。从艺术成就来看，把这样多的动物纠结于这座小小的座屏上，布局严谨，疏密适宜，前后、上下、左右都很对称，可见作者颇具匠心。而且，所有动物的形象，个个鲜明生动，呼之欲出，刀法娴熟，线条圆润流畅，表明了作者技法高超。同时以黑漆为底施以朱红、灰绿、金银等彩绘，色彩绚丽，鲜艳夺目，更增加了动物的生动性。所以，这件座屏，堪称我国古代木雕艺术的瑰宝。

彩绘虎座鸟架鼓，是楚国木雕艺术中的另一件珍品，该鼓以一对相背而卧的猛虎为座，虎背上相背矗立着一对巨大的禽鸟，双鸟冠与双鸟尾连结处，形成三角形鼓架，使这只双面鼓悬空而挂，鼓架上涂以彩色髹漆。造形奇巧，形象别致，刀法娴熟，色彩绚丽，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

楚国的哲学和史学也很发达。春秋末年，楚国人老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相传孔子曾经向他请教礼，老子告诫他说：“善于做买卖的人，深深地收藏自己的宝货。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外貌好像很愚鲁。你应该克服那些对你毫无好处的骄气与贪欲。”孔子非常佩服他，回去对弟子们说：“老子不是鸟兽虫鱼所能相比的，他的思想非常广阔，好像龙一样，乘风云而上青天。”

老子著述五千余言，叫《老子》。《老子》一书分《德经》和《道经》两部分。老子是一个伟大的哲人。他在《道德经》中，把“道”作为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体，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也是客观规律，是绝对永恒存在的本体。他的著作最初形成了唯物主义体系。

关于“道”作为事物本体的表述，贯穿于《道德经》五千余字之中，系统地反映了老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他根本否定了神的存在。否定了神对世间万物的创造和主宰。早在两千多年以前，《道德经》就包涵了无神论思想，是很了不起的。但是，《道德经》中表述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有缺点的。比如说“道”和“无”概念就有许多含混不清的地方。这反映了老子唯物主义思想的直观性、幼稚性、不彻底性。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下，这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缺点，被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有神论者利用和发展，而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唯物主义思想的正确内涵。

在《道德经》里，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孤立的，描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充满着对立统一的矛盾现象。老子不仅认为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互相对立统一，而且还认为一切事物内部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统一。老子观察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对立，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现象。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反映了老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在《道德经》里，老子多次提出，观察事物要客观，不能主观。在这里，老子的认识论是含有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意思的，接近于唯物主义认识论。但老子没有看到斗争在事物转化中的作用，主张“知足”，“寡欲”，提倡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实行“无为而治”。

老子的思想极为丰富。德国18世纪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思想很贫乏，老子才是“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德国另一位哲学家尼采评论老子说，他“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在中国，唯物、唯心两派都从他那里各取所需。道教在形成过程中，也利用他的巨大影响，利用“道”、“自然无为”等学说，然后加以附会引伸，制定了道教的教义，把他尊为道教的创始人，上尊号为“道德天尊”。唐朝，他被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宋朝，他被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我国历史学源远流长。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春秋时期楚国也正式设立了太史和左史。楚国在史官记载史事的基础上，也曾经编过史书。孟子说“晋之《乘》，楚之《铸机》，鲁之《春秋》，一也。”可见，楚国的《铸机》和记载鲁国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一样，是记载楚国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不过，《铸机》一书早已失传，现在流传的《楚史铸机》是后人伪作的。

楚国历史与文化，光辉灿烂，是一个奥妙无穷的迷宫。楚国人民在农业、手工业、天文历法、文学、音乐、绘画、雕刻、哲学、史学等方面的光辉成就，随着最近几十年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楚文化考古的发现，方得以昭彰于世的。关于楚族的源流，楚族何时形成的，古楚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等等，这都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楚文化的奥秘，有待人们继续去探求。

楚汉之争 高祖称帝

秦王朝灭亡以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谁来执掌已经夺取的政权，成为项羽和刘邦两个集团的主要矛盾。根据楚怀王与诸将的约定：谁先进关中就当王。刘邦自然要求履行约定。项羽虽然没有先入关中，但在歼灭秦军主力、推翻秦王朝的战争中，实际上起着主要作用。他听说刘邦准备称王，勃然大怒，要立即攻打刘邦。这样，两个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楚汉之争”。

公元前206年11月，项羽进军函谷关，然后到达咸阳，率军40万驻扎在鸿门；刘邦以十万兵力驻守霸上，两军形成对峙的局面。刘邦手下有个人向项羽报告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子婴当宰相，想独吞珍宝。”项羽的谋士范增也说：“刘邦从前在东方，贪财好色。可这次入关，既不要财宝，又不要美女，一定是打算夺取天下，必须赶快把他消灭。”于是，项羽下令犒赏三军，准备明天一早进攻刘邦。

当时，刘邦兵力弱小，远不是项羽的对手。项羽的叔父项伯同刘邦的谋士张良很友好，当天夜里就跑去告诉张良这件事，要张良跟他离开。张良忠心为主，没有悄悄逃跑，马上报告了刘邦。刘邦大惊，快请张良想办法。张良认为只有通过项伯才能挽救，于是介绍他们二人相见。刘邦一见到项伯，又是敬酒，又要与他结秦晋之好，并且说进到关中后，什么也不动，全部封存起来等项将军来了处理，请项伯向项羽转达这个意思。项伯满口答应，让刘邦明天清早亲自向项王赔礼道歉。刘邦连忙说好。这样，项伯连夜回到楚营，把刘邦的话转告了项羽，还说：“要是刘邦没有先入关中，您也不可能这样顺利地进来。他立了功而您却要杀他，这是不讲义气，不如好好对待他。”听了这话，项羽也就同意了。

第二天清晨，刘邦带着一百多名随从到鸿门拜见项羽。项羽便摆宴招待刘邦。席间，刘邦说：“我和您共同攻秦，您在河北与秦军激战，我从河南进兵。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先入关中破秦，今天在这儿见到您。现在有人挑拨咱们不和。”项羽回答：“这是您手下的曹天伤说的，要不然我怎么会误会。”这时，范增一再向项羽示眼色要他杀掉刘邦，项羽没理会。于是，范增出去告诉了项庄，项庄不久就进来祝酒，并说：“项王和沛公在这儿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娱乐，请让我舞剑助兴吧。”项羽说：“好”，于是项庄便拔剑起舞，伺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忙拔剑与他对舞，保护刘邦，项庄一时无从下手。张良一看不妙，忙出去找到刘邦的卫士樊哙，说事情危急，项庄在席前舞剑，意图要刺杀沛公。樊哙便持盾拿剑闯入大帐，面对项羽，怒目而视。项羽按剑挺身，喝问干什么的。张良在一旁代答：“这是沛公的卫士樊哙。”项羽点头称赞，并赏他一杯酒。樊哙拜谢之后，一饮而尽。项羽又赏他一个猪肩。樊哙放下盾牌，把猪肩放到上面，拔剑切下来就吃。项羽问：“壮士，还喝酒吗？”樊哙说：“我连死都不怕，何况一杯酒！从前秦王朝就喜欢用刑杀人，所以天下人都起来反对他。现在沛公劳苦功高，不仅得不到奖赏，大王反而听信谗言要杀他。这岂不是走秦朝的老路吗？”项羽无话可说，喝叱项庄退下去。

一会儿，刘邦推说上厕所，樊哙、张良也跟了出来。刘邦想走，又觉得没有告辞不好，樊哙说：“形势严峻，还告什么辞啊！”于是，张良留下善后，樊哙等人保护着刘邦，抄小路回到霸上大营。

张良约摸刘邦已赶回到军营后，才回去对项羽道歉说：“沛公酒喝多了，不能亲来辞行，叫我向大王献上白璧一对，玉斗一双赠大将军和范先生。”项羽无可奈何，收下了礼物。范增却拔剑把玉斗劈个粉碎，愤愤地说：“夺项王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们今后都要做他的俘虏了。”

过了几天，项羽率兵进入咸阳，杀了秦王子婴，挖了秦始皇的坟，把财宝美女抢劫一空，还放火烧了秦的宫殿，大火着了三个月才熄灭。

项羽尽管目光短浅，决策失误，但他当时拥有最强大的兵力。他自恃功高，要主宰天下。他把楚王放逐到江南，自称西楚霸王，以梁、楚九郡作为领地。与此同时，项羽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以同自己的关系亲疏而有所轻重。

赵国大将陈余因为巨鹿大战之后与张耳分裂，没有随同诸侯联军进入关中，只封为侯。齐相田荣由于同项羽不和，什么也没得到。原有的各诸侯国都大大缩小了地盘，或者失去了有利地区，所以大家都满怀怒气。尤其是把刘邦封在巴蜀汉中，这是秦朝流放犯人的地方，等于公开贬逐，他更是不服。项羽把秦降将封在三秦，用来钳制刘邦，但这三人在关中根本站不住脚，实际上给刘邦向东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互相矛盾重重，项羽所建立的秩序不可能维持下去。各国国王刚刚退出咸阳，齐相田荣就赶走齐王田都，又杀了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揭开了反楚大战的序幕。一场诸侯大战重新开始了。

陈胜起义之初，曾派周市北征到齐地。齐国旧王族田儋乘机在狄县起兵，杀死狄县令，自立为齐王。然后，他派兵攻打周市，周市败走，这样田儋便据有了齐地。后来，章邯率秦军东征，大破齐、魏军，杀死了田儋。田儋的弟弟田荣收拾残兵败将，退到东阿。章邯乘胜追击，把东阿团团包围，形势危急。项梁听说东阿危急，率领楚军打败章邯，解救了田荣。田儋死后，齐人另立田假为齐王，田角任丞相。田荣解围之后，立即带兵攻打田假。田假失败，逃奔楚怀王，田角逃到赵国。田荣便拥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自任相国，弟弟田横为将军，割据齐地。后来章邯援兵来到，项梁要田荣出兵，共同抗击秦军。田荣以楚国没有杀掉田假为借口，拒绝出兵。结果章邯大破楚军，项梁战死。接着章邯攻打赵国，田荣又因赵国没杀田角，也不肯出兵救赵。后来诸侯联军入关，田荣也就没有参加。项羽分封诸王，也就没有田荣的事儿。但他手中有实权，岂肯善罢甘休。他攻齐王田都，杀胶东王，自立为齐王。同时，他大力扶植不满项羽的人物，纷纷起兵反楚。

刘邦开始攻打昌邑时，当时正在这一带活动的彭越曾经来参加。刘邦带兵西走后，彭越仍留在这一带单独作战。等到诸侯联军攻入关中灭秦后，彭越已发展到有几万人，成为一支独立诸侯王之外的力量，所以项羽封王时对他也没有安排。田荣反楚后，便拉拢他反楚。彭越欣然同意。张耳回国后，陈余大为不满。他认为张耳同他不相上下，现在张耳封王，而他只是区区三县之侯，怨恨项羽对他不公平。田荣带头反楚，陈余便去联络共同反楚。这正合田荣下怀，马上答应出兵，援助陈余进攻张耳。张耳逃奔刘邦，陈余便迎接赵歇回赵复位。赵歇便立陈余为代王作为报答。这样，在东方出现了齐、赵和魏国部分地区联合反楚的联盟，直接威胁项羽。项羽凭借军事力量，把分封割据强加于人。这时候，项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得不调兵遣将，对付反楚力量。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平定齐、赵反楚力量，刘邦已经挥师向东，直指三秦了。

刘邦对于项羽不履行约定却改封他为汉王，实在不能容忍，准备发兵与项羽决一死战，他的文官武将如萧何、周勃等人，纷纷加以劝阻。萧何建议先进汉中，招揽人才，等待时机成熟再定。张良给刘邦献计，在前往封国时，烧毁汉军所过栈道，表示无意东向，此去不还，让项羽放心，项羽果然放松警惕。

这时候，汉军士气低沉，纷纷逃跑。但是，项羽部下一个无名小军官韩信，因为多次向项羽献计都没有被采纳，这时转而投奔汉军。韩信同萧何交谈过几次，萧何十分佩服他的才能。行军路上，沿途逃跑的军官竟有几十人。韩信因为还是得不到重用，也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走，来不及报告刘邦就亲自连夜去追韩信。有人向刘邦报告萧何也逃走了，刘邦大怒，像失掉了左右手一样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两天，萧何回来见刘邦，刘邦又高兴又生气，问萧何为什么要逃走。萧何回答：“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刘邦又问：“这么多人逃跑。你追谁啊？”萧何说：“追韩信。他是天下第一人才。您如果愿意呆在汉中，倒用不着他，要是还想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再找不到人可以商量大计了。您重用他，他才肯留下，否则还是会逃走的。看您决心怎么办吧！”刘邦当然是想争夺天下，于是接受了萧何的意见，举行隆重典礼，拜韩信为大将。

韩信被拜为大将，全军都轰动了。举行了典礼之后，刘邦半信半疑地问韩信：“萧何多次向我推荐您，请问您有什么高见？”韩信客气了几句，便反问刘邦：“争夺天下不就是和项羽斗吗？您自己看您和项羽谁有力量？”刘邦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我不如他。”韩信说：“这很好，我也认为您不如他。不过，我想跟您进一步谈谈项羽这个人。项羽勇武过人，但他不会用将，只不过是匹夫之勇。他对人礼貌亲切，但舍不得封官赐爵，这叫做妇人之仁。他分封天下诸侯不公平，诸侯们不满。他军纪败坏，路过的地方便烧杀抢掠，老百姓都很痛恨。名义上他称为霸主，实际上他失掉了民心。因此，这种强大是很容易转化为弱小的。现在，您如果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任用有才能的人，把天下城邑分赏给功臣，率领盼望东归故乡的战士们打回老家去，必然所向无敌，势如破竹。同时，项羽所封的三个秦王，原来都是秦朝的大将。他们率领秦军转战各地，多年来伤害的老百姓不知有多少。特别是他们投降项羽之后，20多万秦军在新安全被活埋，只有他们三个当将领的得以活命。秦地的老百姓对这三个将领切齿痛恨，项羽却把他们分封在秦地为王，老百姓没有一个人满意的。您最先入关，军纪严明，约法三章，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老百姓都盼您在秦地当王。按照诸侯原来的协定，您也应该为王，这一点老百姓都知道。后来您被项羽所迫到了汉中，秦地的百姓都很惋惜。现在，您如果回军三秦，只要送去您的布告就可以把三秦拿下来，不费吹灰之力。”听完了韩信这番话，刘邦非常高兴，只恨同韩信相见太晚了。于是，刘邦对韩信言听计从，听从他的安排，部署进攻。为了保证进军顺利，刘邦命令萧何留守汉中，为前线准备粮草。

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从汉中率兵出故道（今陕西宝鸡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袭击雍地，雍王章邯仓惶迎战，在陈仓被打得落花流水。后来又在畤（今陕西乾县东）相战，章邯又溃不成军，只好南逃废丘。刘邦平定雍地之后，一面把章邯围困在废丘，一面派众将攻打陇西、北地和上郡。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被迫投降。这样刘邦迅速占领了关中地区。

刘邦顺利进军关中，项羽腹背受敌，东有齐、赵反楚，西有刘邦占领关

中，诸侯纷纷起兵，项羽穷于应付。他无暇西顾，便封原吴县令郑昌为韩王，企图阻止汉军东进。这时，正在韩国的张良写信给项羽，说刘邦只是想得到关中，履行原约，不敢向东攻打楚国。同时，张良又把齐、梁的反叛书交给了项羽，说齐要联合赵灭楚。项羽果然相信，就率军北上攻齐，使刘邦这方面暂时减少了压力。

公元前 205 年 10 月，刘邦率兵东出函谷关，河南王申阳不战而降。接着，他又派韩襄王孙信领兵攻打韩国，韩王郑昌在阳城兵败投降，刘邦把孙信立为韩王。与此同时，又先后攻取陇西和北地，章邯的弟弟做了汉军的俘虏。同年 3 月，刘邦渡过黄河，魏王豹向汉军投降。之后，汉军又攻占河内，活捉了殷王司马卬。刘邦攻取殷地，项羽大为愤怒，要把楚军都尉陈平杀掉。陈平害怕，从小路渡河，投奔刘邦。刘邦一见如故，拜陈平为都尉，与他同车，让他监护诸将。

这样，刘邦在数月之间，先后夺取关中、河南、河内等战略要地，并与汉中、巴蜀连成一片，成为汉军的大后方。

再说项羽相信齐、赵要合力攻打楚国，在公元前 205 年正月，率领主力北上，企图灭掉田荣兄弟，然后再回师对付刘邦。田荣带兵迎战，双方展开激战，最后田荣兵败，逃到平原，被当地百姓杀死。田荣死后，楚军一路焚烧城郭房屋，活埋田荣降兵，劫掠百姓。齐人纷纷聚集起来反抗，这就使得田横得以收拾残兵数万人，坚持抵抗。项羽因而一时无法脱身。

项羽本意是在灭了田荣兄弟之后，再回头攻打刘邦，不料他的如意算盘被刘邦打破了。公元前 205 年 3 月，刘邦乘项羽北伐田荣之机，大举东进，纠集韩、魏等五路诸侯 56 万兵马灭楚。途中彭越率领三万多人参加，刘邦任命他为魏相国。联军攻占彭城。刘邦在城中搜罗美女珍宝，终日饮酒作乐，欢庆胜利。不料项羽率精兵三万回救彭城，大破汉军。刘邦只剩下几十名骑兵簇拥着，狼狈逃命。路上，碰见了他们离散的儿女，刘邦嫌带着他们跑得慢，竟然几次把他们推下车。幸而驾车的夏侯婴不顾刘邦的责骂，坚持拉着一起走，才把他们救出。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后在逃跑中遇见楚军，被项羽扣留下来当作人质。

当时，全靠吕后的哥哥吕泽还保留着一支完整的军队，驻扎在下邑，刘邦便到那里，收拾残兵。张良建议要设法争取英布、彭越，专任韩信，依靠这三人的力量才能打败项羽。刘邦便派随何去劝诱英布，又派人去联络彭越。5 月，刘邦率残兵退回荥阳，依靠关中后方的支援，赶建防线，阻击楚军的进攻。

九江王英布原来是项羽手下的一员猛将，也是十八王中唯一的项羽部属。但是当项羽攻齐征兵时，英布称病没去，只派兵四千助战。楚汉彭城大战，英布也称病未去，似乎是坐观胜败。项羽因而不满，几次派人去责问并召见英布，英布越发害怕而不敢见项羽。但是项羽考虑到北有齐、赵，西有汉，都是主要敌人，比较亲近的只有九江，英布又善于作战，于是希望争取英布的支持，没有和他决裂。随何掌握了这种微妙关系，明白英布对项羽存有疑惧，就直率地指出他同项羽的关系已经破裂，不可弥合。同时说明楚强只是暂时现象，最后必败，投汉才是他的唯一出路。英布被说动，答应背楚联汉，但还有些犹豫不决。随何就当项羽派来的使者的面，揭穿此事，迫使英布下决心起兵反楚。这样就牵制了项羽的主力，使他不得不先去对付英布。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英布失败。但是，刘邦争取了这几个月的宝贵时间，

形势大有转机。

彭城之战刘邦失败后，诸侯又纷纷背汉投楚，西魏王魏豹借口探亲，回国后便与汉绝交，汉军避实就虚，在正面采取守势与楚相持，并策动彭越袭扰楚军后路。汉军主力则从侧翼进攻魏、代、赵、齐等国，逐步扩大地盘，最后包围西楚。所以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率领灌婴、曹参等统兵进攻西魏。公元前 205 年 9 月，韩信大破西魏，生俘西魏王魏豹。接着，又同张耳领兵北攻赵、代，歼灭代军，然后率军数万准备东出井陘攻赵，陈余等带兵 20 万扼守井陘口。李左车建议据险坚守，派奇兵袭扰汉军后勤辎重。陈余却认为，韩信所部号称数万，其实不过几千人，而且长途行军，必然疲劳。这区区几千敌军都不敢迎战，诸侯一定认为我们软弱，随时都想来攻我们。陈余没有听从李左车的意见。韩信探听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便率兵进到井陘口 30 里处扎营。半夜，韩信点兵，部署战斗。他先选轻骑两千，各带汉军旗帜，抄小路隐蔽在赵军营旁的山上，等到赵军全部离营追赶汉军时，冲入赵营，拔掉赵军旗帜，插上汉军的旗帜。然后，又派精兵一万为前锋，出井陘，背水摆阵。赵军望见，都大笑起来。天明，韩信大张旗鼓，大队人马堂堂正正开出，赵军也开营接战。打了一阵，韩信丢掉旗鼓，退到背水结阵的汉军前锋中，合力抵抗。这时，赵军认为汉军已经败退，后边有河，无路可逃，于是全军齐出，都想立功。埋伏在赵军营旁边的两千汉军，乘虚突入赵军营，全都换上汉军旗帜。这时，后退无路的汉军，在韩信指挥下拼死抵抗，赵军一时无法取胜，再想退回本营，却见都已被汉军占领，顿时全军惊慌失措，溃不成军。汉军前后夹攻，大破赵军。战后，众将问韩信：“兵法上忌讳背水结阵、怎么您这样布置却能打胜呢？”韩信说：“这也是兵法上讲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这支部队，并不是训练有素的精兵，要是放在方便的地方，一遇到挫折就会溃散，还能坚持战斗吗？只有这样无路可逃，才能大家齐心拼命啊！”众将无不佩服韩信。

韩信下令不准伤害李左车，活捉他的给以重赏。于是，有人把他捆了送来。韩信解开绳索，请他上坐，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请问北伐燕、东攻齐的策略，李左车说，“您出兵以来，攻无不胜，声威大振，这是您的长处。但是汉军疲惫不堪，实际上战斗力不强。如果敌人据险坚守，那么就很难攻克，这是您的短处。用兵必须扬长避短。您现在最好是按兵不动，休整军队，蓄精养锐，派人送信给燕王，宣扬汉军声威，燕王必然害怕屈服。燕国归顺了，再派使者到齐国，齐国也会归顺。”韩信听后，连声称好。于是，他按照李左车的意见，派使者到燕国，燕国果然降服。但齐在项羽回军与刘邦对峙时，已经乘机收复各地，巩固了政权。这时听说韩信即将东进，便集结军队准备迎战。汉兵也暂时不出击，留在赵地扩大战果，随时反击来攻的楚军。刘邦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赵国，并征兵补充据守荥阳一线的汉兵。

但是，由于楚军主力集中在荥阳前线，刘邦经常失利。公元前 204 年 4 月，荥阳战局日趋紧张。楚军发动凌厉的攻势，终于把刘邦围困在城里。情况十分危急，刘邦忧心忡忡，被迫向项羽讲和。范增说：“刘邦现在很容易打败，如果放过他，将来必定后悔。”于是，项羽坚持攻打荥阳，不许求和。这样刘邦更是担忧。因此，陈平建议利用反间计，分化项羽君臣，从内部瓦解楚军。陈平认为，项羽集团的上层核心，只有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人。项羽为人狐疑，如果拿出重金，离间他们君臣，促使他们自相残杀，这样就可以乘机大破楚军。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交给他黄金四万斤，让他

去办理这件事。

陈平身负重托，带着重金，派人到楚营活动去了。他们散布流言说，钟离昧这些楚军将领，为项王立下了赫赫战功，却得不到封地的好处。他们想联合汉王，消灭项羽，然后平分他的地盘。项羽果然中计，对钟离昧这些将领，十分怀疑。

项羽疑心重重，竟派使者去汉营，想探听个究竟。为此，陈平特地备下丰盛的宴席款待。等到一见项羽的使者，却故作惊讶的神态说：“我以为是亚父（范增）的使者，原来是项王派来的使者！”说罢，立即撤去宴席，换上粗简的饭菜。使者回去如实报告了项羽，于是项羽更加怀疑范增通敌。范增建议急速攻取荥阳，项羽不采纳他的意见。范增得知项羽对他怀有疑心，不禁怒火中烧，于是他对项羽说：“天下的大事已经定局，你自己干吧，我想回老家种田去。”范增离开荥阳，因背生毒疮，病死在路上。这样，项羽自恃勇武，刚愎自用，好猜忌，信谗言，把仅有的一个谋士也气走了。

汉军巧用反间计，分化瓦解楚军上层核心，然而荥阳之围并未解除。于是，汉将纪信对刘邦说：“情况万分危急，请允许我假扮汉王宣布投降，以便您寻找机会逃走。”于是，在一天夜里，陈平打开荥阳东门，放出两千多名妇女，都是披甲戴盔，一身士兵装束。纪信乘上刘邦的黄屋车，车前打着汉王的大旗，前呼后拥地出了东门。他们一路高喊：“粮食吃完了，汉王投降啦！”楚军一听，立即欢呼起来，纷纷涌到车门观看。就在这时，刘邦乘机带着数十人从西门逃走了。项羽发觉上当，把纪信活活烧死。

刘邦逃出荥阳，在关中组织了一支军队，改从武关出，从南阳向东进发。项羽也南下迎战，刘邦却坚守不出。这时彭越在楚军后方流动作战，袭击项羽的粮食运输线，项羽不得不回军攻打彭越。刘邦乘机率军北上，打败留守的楚军，占领成皋（今河南巩县东）。项羽打败彭越后，又急忙回师包围成皋，刘邦兵败，只身逃出，北渡黄河。清晨，他自称是汉王使者，闯入韩信、张耳大帐，拿过兵符印信，接管了这支军队。接着，他派张耳往北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准备发兵攻打齐国。

刘邦得到韩信这支部队后，军威重振。他派刘贾带兵两万渡过黄河，配合彭越袭扰楚军后路，烧毁他们的军粮。项羽命令曹咎坚守成皋，自己亲率精兵东击彭越。但当他在东方获胜时，刘邦诱使曹咎出战，大败楚军。曹咎自杀，汉军夺得成皋。项羽又急忙回军，与刘邦对峙，当时，酈食其以为只有齐国还没有攻下，就自告奋勇到齐国劝降，刘邦同意。齐王田广听信了酈食其的意见，派人与汉军联络，撤去了守备。韩信乘虚袭击齐军，直逼齐国都城。田广大惊失色，以为酈食其出卖自己，下令把他烹杀了。接着，田广率兵逃到高密，派人向项羽求救。项羽从当时形势出发，派大将龙且率兵20万救齐。但龙且骄傲轻敌，韩信大破楚齐联军。

韩信平定齐国后，上书请求刘邦封他为“假王”镇抚齐国。刘邦得信后大骂不止，说，“我被困到这儿，早晚都盼着他来救我，原来他在想自己称王呢。”张良、陈平急忙制止他，悄悄对他说：“我们现在正困难，岂能阻止韩信称王？不如趁势封他，妥善对待，不然会出大事。”刘邦也醒悟过来，立即改口说：“大丈夫要当王就当真王，何必要求代理呢？”于是，刘邦便派张良为特使，去封韩信为齐王。同时，征调韩信的军队攻打项羽。

楚汉相持了好几年，项羽打了不少大胜仗。光是刘邦本人所受重伤就有二十多处，好几次差点被活捉。但他依靠萧何经营关中，作为军事基地，提

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补充，所以屡败屡起。同时，他还能多方争取盟友，牵制和削弱项羽，逐渐由弱变强。

相反，项羽的后方却经常遭到破坏，尤其是彭越活跃在西楚本国和前线的交通运输线上，对楚军后勤供应威胁极大，使项羽非常头痛，不得不几次回师攻打。尽管项羽所向披靡，却也疲于奔命，众叛亲离，以至越战越弱。

有一天，项羽想出一个“绝招”。他在两军阵前筑了一个高台，把刘邦的父亲摆在肉案子上面，对刘邦说：“再不赶快投降，我就把你父亲烹死！”然而，诡计多端的刘邦回答说：“从前我和你曾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把你的父亲煮了吃，希望你也分一杯肉汤让我也尝尝。”项羽气得暴跳如雷，打算杀死太公。项伯劝他说：“局势现在还很难说，留下来做人质也许更好些。而且，打算争夺天下的人都是不顾家的，就是把太公杀了，也没有什么用处。”项羽觉得也是，这才侥幸保住了太公一条老命。

后来，项羽又向刘邦提出挑战，说：“几年来天下不安，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争夺。我愿意与你单独决斗，分个胜负，不用老是劳苦天下的老百姓。”刘邦却历数项羽十大罪状，最后说：“我举义兵，率领诸侯惩治罪人。你吩咐部下把你处决就是了，我何苦还要与你决斗？”项羽大怒，一箭射中刘邦胸口。机智的刘邦忙弯下腰，摸住脚趾头说：“狗强盗射中我的脚趾头了！”

刘邦退回营中养伤，张良请他忍住疼痛，到各部巡视，安定军心。刘邦伤好后，又回关中巡视一番，率领一批援军重返前线。

后来，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从南翼威胁楚军。齐王韩信也发兵攻楚，彭越继续骚扰楚军后方。在这种情况下，项羽被迫与刘邦讲和。以鸿沟为界，西属汉、东属楚，中分天下。项羽释放了刘邦的父亲和吕后，撤兵东归。

在这关键时刻，张良、陈平提出乘胜追击，消灭项羽，张良等说：“如今汉已有大半个天下，诸侯无不归附。楚兵疲粮尽，正是灭楚的好时机。现在放过不打，必将留下无穷后患。”刘邦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公元前202年10月，刘邦率军东进，追到固陵，却不见预定在这里会合的韩信和彭越两军。项羽见刘邦孤军深入，挥师反击，大败刘邦。刘邦被迫后退，坚壁固守。刘邦问张良：“诸侯不肯如约，如何是好？”张良回答：“楚军眼看就要被消灭了，韩信、彭越却还没有封地，自然不肯来。您如果能同他们共享天下，他们马上会来。如果不愿意，事情还很难说啊！您要是把陈以东滨海一带封给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让他俩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楚军就容易打败了。”刘邦依计而行，韩信、彭越果然立即进兵。

11月，英布、刘贾也进攻九江郡，劝诱项羽的大司马周殷叛楚，共同率兵会战。12月，项羽退守垓下，所余之部大约还有十万多人，但已无斗志，汉军及诸侯军把项羽团团包围起来。一天夜里，从四面传来一阵阵楚歌，项羽大惊。眼看大势已去，项羽便带八百余骑突围南逃。天明时汉军发觉，灌婴率五千骑兵追击。项羽渡过淮河时，骑兵只剩一百多了。又继续退到阴陵，由于迷路而陷入一片沼泽地，绕来绕去就被汉军追上了。好不容易逃到东城，只剩下28名骑兵随从，而汉军追兵有好几千人赶到了。项羽自知无法逃脱，便将仅有的28骑分为四队，向四面突围冲杀。他首先冲向汉军，斩杀汉军兵将数十、上百人。

最后，项羽退到乌江边，准备渡江。乌江亭长告诉他只有这一只船，催

他赶快上船过江。项羽想起当年率江东八千子弟攻秦，至今没有一人生还，竟不肯渡江。他把马送给乌江亭长，与汉兵肉搏，又杀伤汉兵多人。最后，他身负重伤，拔剑自杀。

曾经叱咤风云的项羽失败了，刘邦最后取得了胜利。

持续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结束了。

西汉文景之治

汉高祖刘邦死后，他的儿子刘盈即位，即汉惠帝，吕后成了吕太后。7年之后惠帝死去。

惠帝没有儿子，吕太后自作主张从外面找了一个婴儿来冒充惠帝的儿子，接替汉惠帝做了皇帝。这样一来，吕太后就名正言顺地把持中央大权，临朝执政了。

吕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打算立吕家的人做王，于是就陆续把她的内侄、侄孙，像吕台、吕产、吕禄、吕嘉、吕通等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整个朝廷大权几乎全落在吕家的手里了。

吕后一家夺了刘家的权，大臣中不服气的人不少，像右丞相王陵等人，只是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说罢了。

吕太后临朝执政8年多，临死前仍不放心她的吕家天下是不是很稳固，就又封侄子吕产为相国，统率北军，吕禄为上将军，率领南军。这样军权就完全掌握在吕家的人手里了。吕太后才安心地死去。

吕太后死后，兵权都在吕产、吕禄手里。他们想发动叛乱，但是一时不敢动手，他们怕刘邦的那些大臣起兵反抗自己。果然，刘邦的孙子刘章与齐王刘襄一起发兵西进，要消灭吕氏的势力。

齐王刘襄向西进兵时，吕产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将军灌婴带领兵马来对付。灌婴一到荥阳，就跟部将们商量说：“吕氏统率大军，想夺取刘家天下。如果我们向齐王进攻，岂不是帮助吕氏叛乱吗？所以，咱们不能一味听从吕产的命令，而忘了高祖皇帝的恩典”。

大家商量下来，决定按兵不动，还暗地里通知齐王，要他联络诸侯，等待时机成熟，一起起兵讨伐吕氏。齐王接到通知，也就暂时按兵不动了。

周勃、陈平知道吕氏要发动叛乱，他们想要先发制人，但是兵权在吕氏手里，怎么办呢？周勃认为最重要的是掌握兵权。

周勃想了个妙计，用谎话骗吕产把北军的兵权暂时交给周勃掌管。

周勃拿到了将军的大印之后，马上跑到北军的军营中，向将士们讲明自己决定拥护刘家人做皇帝，反对吕家人篡夺皇帝宝座。士兵们平时也看不惯吕产等人的坏样子，听周勃这么一讲，马上高呼“我们拥护刘家人，我们愿跟着周勃将军消灭吕家的势力！”就这样，周勃顺利地掌握了北军的指挥权，把吕禄的兵权夺了个干干净净。

吕产还不知道吕禄的北军已落在周勃手里，他还准备按原计划行动呢。他跑到未央宫想要发动叛乱。周勃派朱虚侯刘章带了一千多个兵士赶来，把吕产捉住之后杀了。接着，周勃带领北军，把吕氏的势力全部消灭了。

到这时候，大臣们胆子就大了。他们再也不怕吕太后报复了。他们说：“从前吕太后所立皇上不是惠帝的孩子。我们不如再在刘氏诸王中推一个最贤明的立为皇帝。”

大臣们商议的结果，一致认为代王刘恒在高祖的几个儿子中，年龄最大，品格最好，就派人到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把刘恒迎到长安，立为皇帝，他就是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是高帝刘邦的小儿子，他的母亲薄姬不受刘邦的宠爱，因而也没有遭吕后嫉恨。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恒仅仅8岁就被立为代王，封国在今山西中部，当时属偏僻边区，远离政治中心，与汉廷的权力斗

争没有多少牵连。正由于这样一种比较超脱的地位，才使他得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功臣集团和琅邪王刘泽等刘氏宗室的一致赞同，越过一直想登上帝位首先起兵声讨诸吕的齐王刘襄而坐享其成。他确实是在臣民欢迎拥戴之下，正大光明地当了皇帝。这就使他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能够坚持原则驾驭群臣。再加上他深明君道，很有政治才能，所以，他的统治不仅为汉王朝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二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史上也颇具特色。因而被许多旧史家称颂为可以同西周的贤明君主成康媲美的治世，一直被誉为封建帝王中的一位明君。

刘恒和他母亲薄氏在山西居住的时候，生活比较清苦，他们经常与普通老百姓接触，也很了解民间生活的艰难情况。另外，由于以前战争造成的破坏还没有完全恢复，国家仓库里的钱粮还不多，政府想要收捐收税也经常收不起来。所以，他想到首先要办的事情是恢复农业生产。每年春耕开始的时候，他亲自带着文武百官到首都长安的郊外去耕地、下种。另外，他还叫皇后在皇宫的园地里种桑养蚕，为广大农民做出了榜样。

汉文帝继续推行汉初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特别是注意修改苛刻的刑罚，以松弛一下秦王朝遗留的过分紧张的政治局面。当时的许多刑罚都是照抄照搬前朝秦始皇曾经实行过的苛刻法令；而这些酷刑的确太残忍了。而最不得人心的一种法令就是肉刑和连坐法。肉刑是根据犯罪程度轻重砍去犯人的鼻子、手或脚；连坐法是一人犯罪，全家都跟着受处罚。这些法令都被汉文帝先后废除了。

说到废除肉刑，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

公元前 167 年，在山东临淄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缇萦（淳于是姓）。她的父亲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为人很老实。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不久出了名。后来他做了太仓令，即管粮仓的官。但他不愿意跟做官的来往，也不会拍上司的马屁。没有多久，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

有一次，有个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那个女病人吃了药之后很久，病没见好转，过了几天就死了。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状，说“淳于意治病的手段不高，却故意治死病人，是图财害命，应该处罚他。”

当地的官吏也许是受了那位大商人的贿赂，没怎么审问，就判他有罪，应该受“肉刑”，要把他押到当时的首都长安去受刑。

淳于意一共有 5 个女儿，可是没有儿子。他被押解到长安去离开家的时候，看着哭哭啼啼的女儿们叹气，说：“唉，可惜我没有男孩，遇到紧急的事，一个有用的也没有。”

几个女儿都低着头伤心得直哭，只有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想：“我就不信为什么女儿偏没有用呢？”

她提出要陪父亲一起上长安去，争取救父亲一次，家里人再三劝阻她也没有用。

缇萦到了长安之后，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守门的官员，请他们交给汉文帝。

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反而很重视。那奏章上写着：“我叫缇萦，是山东临淄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一次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皇帝您想一想，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就不能再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所以

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重新做人。”

汉文帝看了信，十分同情这个小姑娘，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就召集大臣们，对大臣说：“犯了罪该受罚，这是没有话说的。可是受了罚，也该让他重新做人。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的肢体，这样的刑罚怎么能让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呢？你们应该改一下法律，废除肉刑，用别的刑罚来代替它。”

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在一块儿合计以后，也认为肉刑太不合理了，建议以罚做苦工来代替脸上刺字，以打三百板子来代替割鼻子，以打五百板子来代替砍脚。他们把这种新办法呈报给汉文帝，汉文帝觉得可以执行，就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从此，肉刑正式废除了。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不但勇敢地救了她的父亲，并且使天下所有该受肉刑的犯人都减轻了刑罚。

可是汉文帝改革肉刑的做法是很不彻底的，因为打板子，仍然是一种肉刑。而且板子打得重了，打不到三百、五百就能够把人打死。后来，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又进一步改革，把该打五百板子的减为打三百板子；该打三百板子的改为打一百板子。打人用的板子，也改得小了一点，并且规定一律打犯人的屁股，不许打身上别的地方。打板子的时候，由一个衙役从头打到底，中途不许换人。这样，肉刑虽然没有完全废除，但是又进一步减轻了一些，对人民还是有利的。

文帝先后废除了连坐法、诽谤妖言罪，这次通过小姑娘缇萦的据理力争，又废除了割鼻、断足、砍手等残害肢体的肉刑，代之以打板子的笞刑。这种做法很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适当缓和了专制政府对民众压迫的程度，慢慢地培植一种比安宁平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文帝减轻了一些较重的刑罚之后，对流放之类的刑罚也进一步地减轻了许多。文帝又规定罪犯服劳役有一定的刑期。凡不逃亡而服刑期满的，可免为一般老百姓。改变了自古以来，“凡是受过刑的人，一辈子都不得翻身”的传统制度，这是保护社会劳动力的一项重大改进。文帝晚年由于方士新垣平装神弄鬼欺骗被他察觉，恢复了连坐族诛的酷刑，但除谋反大逆罪以外，其他罪犯还是没有实行连坐法了。加以文帝的大臣们也强调教化，量刑宽大，断案比较审慎，嫌疑不能判定的案子多从宽处理，所以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据说当时一年只有几百件，社会治安几乎达到了儒生们理想的西周盛世的水平。这同秦王朝末年犯人成堆，监狱遍地的残酷景象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正是“文景之治”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

文帝早年曾在民间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了解农民的生活艰苦情况，深知农业对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意义，一再强调说：“农业是国家的最大根本，国家没有农业将无法存在下去；而且农业也是老百姓赖以生活的唯一根本手段。为了显示自己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他总是首先考虑保护农民利益。他一方面恢复古代的“籍田礼”，即皇帝亲自耕种的一种仪式，作出带头种田的姿态以鼓励农耕，另一方面还多次减免田租，有时减一半，有时全免。口赋和徭役也减少三分之二。又还裁减首都长安地区的一部分警卫部队，让这些长期吃闲饭的士兵回家去种地打粮食。当时皇帝和他的亲戚贵族们都养着许多马用来打猎游玩，文帝就把其中的一部分马匹收回来送给驿站用作传递公文驿马，这一措施也减轻了老百姓养马的负担。

文帝看到宫中有许多宫女一辈子呆着，什么大事也做不了，反而白白花费了国家许许多多的钱粮，就决定释放她们回家，让她们去过普通人的生活。这样，既解放了这些失去自由的宫女，又可以让她们生儿育女，为国家多输送劳动力。

对于那些年老体弱无依无靠的老年人，以及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文帝也非常关心。他命令政府的有关部门借钱给这些可怜的人，设法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不久他又从政府的仓库里拨出一部分麻布、绸缎和丝绵来，赠送给他们做衣服穿。对于那些有儿有女，但是岁数非常大的老年人，汉文帝也特别尊敬他们，专门规定家里有 80 岁、90 岁以上老人的，可以减轻赋税负担。为了照顾老年人牙口不好的特点，政府定期发给老年人熬粥用的大米，还经常发给他们肉，使他们能够生活得愉快，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在文帝统治中国的西汉时期，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为了保证老百姓有足够的粮食吃，他还不断地减轻农民负担，少收租米、少派赋役、少发徭役，这些措施实行起来，很受老百姓的欢迎。

文帝所以能够不断减轻老百姓的租赋徭役，关键在于他严格地控制了政府开支。他在位 23 年中，没有新建宫室和帝王花园，还经常撤消旧有的园林，将土地赐与贫民。有一次他打算修一座露台，工匠造预算说是要花费一百两金子。他听了便说：“百金是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啊！我享用先帝留下的宫室都感到不配而羞愧，还修露台干什么！”马上打消了修露台的想法。他平时节省宫廷生活费用，修建陵墓也不用金银贵重物品殉葬，只用些陶器，建筑也尽量省工。临死时下遗诏说，天下万物有生就有死，不必过于悲伤。丧事一切从简。汉文帝除了自身带头节约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保境安民的原则，尽量避免用兵作战。当时将军陈武等建议出兵，恢复秦王朝时疆土。文帝却说：打仗是凶险的事情，即便能够获胜，损耗也很大，民众受不了。我只希望边境保持和平安宁，好处就很多了，暂且不必考虑用兵攻取。他曾派陆贾出使南越，通过交涉折服了割据南方自号“武帝”的赵佗，使他纳贡称臣不再扰边。又采纳晁错的建议，移民充实北部边区，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力量。由于他采取守势，努力减少军事活动，这样就使得人民的徭役负担大大减轻，有可能安心生产，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粮食价格降到十多钱一石，国家和个人都储存有许许多多的粮食，老百姓再也不必为生活而犯愁。全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和平而繁荣的安定局面。

文帝之所以能采取这一系列好政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关键在于他善于听取大臣们的不同意见，而不怕大臣冲撞他，失面子。他有一个大臣叫张释之，是个正直而有才干的官员。当他向文帝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文帝告诉他尽管讲出来，不用讲一些大话、空话，要谈就谈当前具体可行的意见。于是张释之就向他讲秦汉的事情，秦所以失败汉所以成功的经验教训，讲了很多，文帝听得非常高兴。后来也还常向他询问秦朝政治的错误之处。不难看出，文帝这一系列政策，正好是与秦王朝的作为处处相反的。显然他是正确地吸取了秦始皇和秦二世奢侈浪费、穷兵黩武、严刑峻法引起农民革命以致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他接受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宣称“天地之间生存着众多的人民，上帝为这些人民挑选君王治理他们；那么做君王的就应该勤勤恳恳的工作，应该时刻先想到老百姓，后想到自己。只有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君王才能够做得长久。”汉文帝的这些想法，当然不可能真正做到，但是同秦二世公开宣扬当皇帝就是只图自己纵情享乐，也的确是完

全对立的两种政治思想。所以，同秦朝堵塞言路的作风相反，汉文帝很能鼓励臣民发表意见，大小群臣提出建议他都能认真听取。讲得对的就嘉奖，错误的就不采纳就算了，也不追究责任。有一次，一个小官冯唐当面指责他不能选任良将，他当时虽然生气地离开了，事后却又把冯唐找来仔细询问并立即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处置。能采纳不同意见，这正是汉文帝突出的优点。

还有一次，汉文帝坐车出城去巡视，刚出城不久，一个乡下农民不小心放跑了自己的牲口，一下子把给文帝拉车的马匹给吓惊了，马匹猛地一跳，差点把文帝从车上掀下来。文帝很生气，命令武士把那位农民抓起来，交给廷尉张释之，让他重重治罪，最好能把那位胆敢惊吓皇帝的农民给杀了。

可是，等文帝回城之后才知道，张释之并没怎么处罚那位乡下农民，只是罚了一点钱就让他回家了。文帝气坏了，马上派人找来张释之，责备他说：“你对那位惊吓我的人处罚太轻了，他把我的马匹给吓惊了，我当时正坐在车上，马匹没命奔跑起来，把我摔下车，我不就很危险了吗？像这样严重的罪行，你这个管法律的廷尉只判他罚钱赎罪，这不是太便宜了他！”张释之从容地回答说：“陛下订的法律是治理全国人民的，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就应当照着去实行，故意加重治罪，就使法律在老百姓中间失去了信用。陛下既然把这个案件交给我处理，我就要处理得公平，不能因为陛下受了惊吓而把案子判重了。罪行有轻有重，轻罪重判，怎么能够叫老百姓服气呢？希望陛下平心静气地考虑考虑吧！”汉文帝听了张释之的辩解，想一想觉得很对，就说：“廷尉说得对。乡下人胆子小，罚他一些钱，把他放了吧！”

汉文帝还下过一道命令，鼓励所有的人都给他提意见，规定老百姓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或愿意给皇帝提个合理建议的，可以给皇帝上书。

经过不懈努力，汉文帝把国家治理好之后，开始考虑处理对匈奴的战争问题。匈奴在中国的正北方，很长时间以来都严重威胁着西汉边境的安全。

汉文帝即位之后，像汉高祖一样，跟匈奴贵族继续采取和亲的政策，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后来匈奴的单于，跟汉朝绝了交。公元前158年，匈奴的军臣单于起兵6万，侵犯上郡（治所在今西榆林东南）和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杀了不少老百姓，抢掠了不少财物。边境的烽火台都放起烽火来报警，连长安城都危险了。

汉文帝连忙派三位将军带领三路人马去抵抗；为了保卫长安，另外派了三位将军带兵驻扎在长安附近：将军刘礼驻扎在灞上，徐厉驻扎在棘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周亚夫驻扎在细柳（今咸阳市西南）。

有一次，汉文帝亲自到这些地方去慰劳军队。

他先到灞上，刘礼和他部下将士一见皇帝驾到，都纷纷骑着马来迎接。汉文帝的车驾闯进军营，一点没有受到什么阻拦。

接着，他又来到棘门，徐厉带着兵士出营迎接，受到的迎送仪式也是一样隆重。

最后，汉文帝来到细柳，周亚夫军营的前哨一见远远有一队人马过来，立刻报告周亚夫。周亚夫去命令将士们披盔带甲，弓上弦，刀出鞘，完全是准备战斗的样子。

汉文帝的先遣队到达了营门。守营的岗哨立刻拦住不让进去。

官员正要同守将争吵不休的时候，文帝的车驾已经到了。守营的将士照样挡住不让进去。

汉文帝只好命令侍从拿出皇帝的符节，赶快派人给周亚夫传话说：“我

是皇帝要进营来劳军。”

周亚夫这才下命令打开营门，让汉文帝的车驾进来。

护送文帝的人马一进营门，守营的官员又郑重地告诉他们：“军中有规定：军营内不许车马奔驰。”

汉文帝点点头，吩咐大家放松缰绳，缓缓地前进。

到了中营，只见周亚夫披戴着全身盔甲，拿着兵器，威风凛凛地站在汉文帝面前，没有叩首，只是拱拱手作个揖，说：“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请允许按照军礼朝见。”

汉文帝听了，大为感动，赶忙也扶着车前的横木欠了欠身，向周亚夫表示答礼。接着，又派人向全军将士传达他的慰问。

慰问结束后，汉文帝离开细柳。汉文帝的侍从人员都愤愤不平，认为周亚夫这个人太傲慢了，对皇帝太无礼了。

汉文帝却赞不绝口，说：“啊，你们不懂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灞上和棘门两个地方的军队，松松垮垮，就跟孩子们闹着玩儿一样。如果敌人来偷袭，不做俘虏才怪呢。像周亚夫这样治军，敌人怎敢侵犯他啊！”

汉文帝视察之后一个月，周亚夫带领汉军向北方挺进攻击匈奴军队，汉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匈奴抵挡不住，赶忙退兵回到北方去了。这样，长安的危险消除了，汉文帝就撤去了防守长安的这三支军队。

周亚夫出色的治军才能受到汉文帝的高度称赞，不久，他就把周亚夫提升为负责首都长安保卫任务的军事将领——中尉。并且对太子刘启说：“周亚夫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而且对国家忠心耿耿：如果将来发生了动乱，用周亚夫领军，肯定能保住我刘家的江山。”

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他就是汉景帝。

汉景帝也像文帝一样，继续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决心把国家治理好。景帝当太子的时候，他有个管家的官员叫晁错，才能挺不错，大家把他叫做“智囊”。汉景帝即位以后，把他提升为御史大夫。

汉朝实行的是郡县制，但是同时又有 22 个诸侯国。这些诸侯都是汉高祖的子孙，汉高祖时分封他们去各地保卫刘家的天下，到了汉景帝那时候，诸侯的势力很大，土地又多，齐国有 70 多座城，吴国有 50 多座城，楚国有 40 多座城。有些诸侯不受朝廷的约束，特别是吴王刘濞，更是骄横。他的封国靠海，还有铜矿，自己煮盐采铜，跟汉皇帝一样富有。

早在汉景帝当太子的时候，吴王刘濞与他就有很大的矛盾。那时，按照以前的规矩，吴王刘濞把他的儿子送到长安来，名义上是陪伴太子一块儿学习，实际上是送个儿子到皇宫里做抵押，表示他并没有谋反的野心。太子刘启和刘濞的儿子都很喜欢赌博，两个年轻人火气都很旺，赌着赌着就会吵起来，有时候甚至还动手打架。有一次，两个人又打起来了。太子刘启顺手抄起赌博用的木盘，一下子就把刘濞的儿子给打死了。刘启派人把死者的遗体送回吴国去安葬。吴王刘濞看到儿子的遗体，怒气冲冲地说：“我和当今皇上都是刘邦的孙子。我的儿子既然死在长安，就应当在长安的皇陵里安葬，为什么要送回来？”他派人把儿子的遗体又送往长安，硬要在皇陵里安葬，他用这种要挟的手段向汉文帝示威，表示他有力量不服气，并且从此以后，他就假装有病，不再到京城里朝见皇帝，积极地准备造反了。

其实早在汉文帝时期，就已经发生了许多诸侯叛乱。对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诸侯叛乱事件，那些拥护中央集权制度的大臣和官吏，都感到事情

很紧张，应当迅速谋求解决的办法。当时，贾谊给汉文帝上书，指出当时诸侯势力过于强大，犹如一个人犯了肿病，一条腿肿得像腰那么粗，一个指头肿得像一条腿那么壮，应当赶快医治才好。贾谊认为医治的办法最好是分割诸侯的王国，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小了，也就不会造反了。晁错，也跟贾谊有同样的看法，建议汉文帝削减诸侯国的领地，分散他们的力量。汉文帝知道他们的建议都很好，但是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不能太性急了。他只是在齐王刘侧死后，因为没有儿子继位，才把齐国分成了六个小国，以此来削减齐国的力量，又把曾经发动过叛乱的淮南国分成了三个小国。

现在景帝即位了，晁错做了御史大夫，他们觉得削弱王国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晁错更是抓住吴王刘濞不到京城来朝见皇帝这个借口，极力劝说景帝应该首先拿刘濞开刀，削夺他的吴国封地。他说：“吴王一直不来朝见，按规定早该把他办罪。先帝（指文帝）在世时对他很宽大，他反倒越来越狂妄自大。他还私自开铜山铸钱，煮海水产盐，招兵买马，准备叛乱。不如趁早削减他们的封地，以绝后患。”

汉景帝还有点犹豫，说：“好是好，只怕削地会激起他们造反。”

晁错说：“他们存心造反的话，削地要反，不削地将来也要造反。现在造反，祸患还小，将来他们势力雄厚了，再反起来，祸患就更大了。”

汉景帝觉得晁错的话很有道理，决心削减诸侯的封地。要抓住他们的罪恶，作为削减封地的理由，很容易！过了不久，有的被削去一个郡，有的被削掉几个县。

晁错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从家乡颍川（今河南禹县）特地赶了出来，他父亲叹了口气说：“你这样做，刘家的天下安定，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老了，不愿意看到大祸临头。”

晁错又劝了他父亲一阵，现身为大臣应该首先想到国家，可是他父亲不体贴晁错的心意，回到颍川老家，服毒自杀了。

晁错正跟汉景帝商议要削吴王濞的封地的时候，吴王濞先造起反来了。他打着“惩办奸臣晁错，救护刘氏天下”的幌子，煽动别的诸侯一同起兵叛乱。

公元前154年，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等七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历史上称为“七国之乱。”

这七个诸侯王都是东方的强国，而且他们都为这次叛乱准备了好多年，吴王刘濞更是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叛乱的打算了。叛军一路向长安进军，声势很大。汉景帝吓怕了，赶忙请出中尉将军周亚夫，拜他为太尉，让他率军去讨伐叛乱的军队。

那时候，朝廷上有许多对晁错不服气的人，报怨他不应该劝说景帝削弱王国土地，结果造成这次严重的叛乱。他们劝汉景帝说：“这些王国叛乱完全是晁错引起的，您只要杀了晁错，答应不再削减他们原来的封地，再免了他们起兵造反的罪，他们自然会撤兵回去的。”

汉景帝听信了他们的话，说：“如果他们真能够撤兵，我又何必舍不得晁错一个人呢。”

不久，就有一批大臣上奏章弹劾晁错，说他大逆不道，应该腰斩。汉景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竟不顾晁错的忠心，批准了这个奏章。这个一心想维护汉家天下的晁错，竟这样莫名其妙地被腰斩了。

汉景帝杀了晁错，派人下诏书要七国退兵。这时候吴王濞已经打了几个

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他听说要他拜受汉景帝的诏书，冷笑说：“现在我也是个皇帝，为什么要下拜？等过一段时间，我还要他下拜呢！”

汉景帝听了下诏书的人回来这么一说，才知道自己错杀了晁错，后悔得不得了。幸亏还有周亚夫带领军队帮他平定叛乱。他把周亚夫找来，寻问他应该怎样同叛军打仗。

周亚夫的确很有计谋，他向汉景帝说：“这些叛军已经准备好多年了。他们人马众多，粮草又非常充足，跟他们正面作战很难取胜，应当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才能制服他们。”汉景帝批准了周亚夫的作战计划，周亚夫领兵出发了。

军队来到霸上，有个叫赵涉的读书人拦住周亚夫献计说：“吴王刘濞占据的地方很富饶，他招兵买马，想要造反已经很久了，这次您出兵去征讨，他肯定会在半路上山势险峻的地方设下埋伏，袭击您的队伍，所以您千万不要从原路行军；应当走蓝田，出武关，直奔洛阳，走这条路虽说远一些，路上要多花一两天时间，但是走这条路出乎吴王他们的意料，他们一定没有防备，等到您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一定会以为您是从天而降的，突然袭击他们，您肯定取胜。”周亚夫接受了赵涉的意见，马上率领大队人马从右路直奔洛阳。

果然，周亚夫率领的大军很快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使得联军的粮食供应发生很大困难，士兵由于饥饿，纷纷逃散。周亚夫乘机发动猛烈进攻，把吴楚七国联军打得大败。楚王刘戊自杀，吴王刘濞带了几千人冲出重围，逃到长江南岸的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他想去联合东越兵卷土重来，可是周亚夫早已悬赏一千斤金子购买他的脑袋，所以东越人不但不帮助他，反而乘机杀了他，把他的脑袋献给了周亚夫换了一千斤金子。至此，历时约三个月的吴楚七国之乱，终于被平定下去了。汉景帝平定了叛乱，虽然仍旧封了七国的后代继承王位，但是打那以后，诸侯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国里征收租税，不许干预地方的行政，权力大大削弱，汉朝的中央政权才巩固下来。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战胜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从此，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社会才进一步得到安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才有了可靠的保障。

解决了王国叛乱问题之后，汉景帝转而重视农业生产问题。文帝时期实行的那一套鼓励发展农业，注意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又被景帝继承下来。另外，他在其他一些方面又作了许多改进。他下诏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到地广人稀地区去从事垦殖。正式确定由租税率为三十分之一，比过去减少一半。又规定男子20岁开始服徭役，比过去推迟几年。这些都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文帝、景帝时期，还特别重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工具。当时有人发明了一种耨犁，很先进，可以节省时间和粮食种子，汉景帝对此很感兴趣，亲自试验耨犁，并下诏向全国推广。耨犁是一种播种的农具，由耨斗、耨腿、犁铧和耨把四部分构成。播种的时候，用牲口拉着耨前进，耨腿下面的小犁铧就在地上开沟，人扶住耨把来回摇动，种籽就通过空心的耨腿均匀地播到了地里。这样，既大大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播种的速度，又提高了播种的质量，能够使农作物产量增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像这样的农业工具当时发明了许多。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丝织、冶铜、漆器是西

汉时期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部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时期帛画和漆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文景这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繁荣。尽管政府不断减轻租赋，国家仍然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据说，到了景帝的后期，国家仓库里的钱不知道积了多少万，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一年年地堆积上去，都满到露天的地上来了，有的甚至霉腐了。民间的生活也非常富足，老百姓大都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所有这些现象，与西汉刚刚建立时完全不一样，经济发展之后，科学文化也相应地发达起来。在文学、音乐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杰出人物。文帝、景帝统治的这段时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和平、稳定、发展的阶段，国家比较强盛，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幸福。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文景之治”。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从西汉到清朝，统治人民思想的一直是儒家思想。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故事。在汉武帝时期采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为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是，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秦王朝很快便灭亡了。经过长期的战争，最后刘邦建立了西汉。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人民生活非常贫穷，就连宰相出入朝廷也只能乘坐牛拉的车。由此可以想见，西汉初年人民生活的水平了。

因此，对西汉的统治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刘邦就曾经向他的大臣们询问现在应该怎样治理国家。大臣们各抒己见，但都一致认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稳定，只有保持稳定，才能统治下去。其中一名大臣陆贾的看法，尤其受到了刘邦的赞赏。陆贾说：“过去骑在马上打天下可以，但现在却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了，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必须进行休养生息，安定人民，发展生产。”刘邦听了陆贾的话，称赞说：“还是陆贾说得好。现在国家刚刚安定，最重要的是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就这样，西汉初期的统治者，大都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思想。所谓“无为”而治，就是国家不把百姓和地方管得太死，而是给地方以很大的自主权，不搞大型的建设，对百姓少收税，鼓励百姓勤苦耕作。在军事上，以训练常备军为主，注重防御，不对周边国家发动战争。

而在指导思想上，则提倡黄老思想，提倡安分守己，本本分分。但仍保持比较自由的学术气氛。

从汉高祖至汉景帝时期，西汉王朝都是采取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产恢复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可以这样说，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到此已经相当富足了，历史上号称“文景之治”。但是，实行“无为”而治的策略也渐渐暴露出了许多弱点，历史已经向前发展了，黄老思想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了。社会的发展现在需要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而不是黄老思想。

西汉王朝，几十年来，一直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渐渐巩固起来。可是，长期实行这种政策却带来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

一是中央政权的权威受到了威胁。长期以来，中央给地方较大的自主权，结果汉初分封的诸王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铸造钱币，拥兵自重，大有凌驾于朝廷之上的气势。中央的权威受到威胁，汉景帝试图铲除诸王的势力，把权力收归中央，但遭到诸王的激烈反对。

二是边境危机。西汉王朝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在保卫边境上显得软弱无力，无法阻止匈奴的猛烈进攻。因此，许多有识之士都大声激呼，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保守”的政策，而代之积极进取的政策。这方面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贾谊，贾谊怒斥黄老思想的消极保守，积极鼓吹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

一切都表明，如果继续采取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国家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现在国家已经比较富足强大了，只有抓住机遇，积极进取，才

是强国之道。

可是，要以儒家的思想取代黄老思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黄老思想是一些保守派的人物的看家宝，他们迷恋黄老思想，不能自拔，坚决反对儒家思想。于是，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日益激烈起来。

皇帝是封建社会的绝对统治者，皇帝本人崇尚黄老思想还是信奉儒家思想，对两派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太子则是未来的皇帝，因此立一位崇尚黄老的太子，还是立一位信奉儒家思想的太子，就直接决定着两派的命运。汉景帝时，保守派和改革派在立太子一事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在争夺太子地位的人选中，最具竞争力的有三个人物。一是汉景帝庶出的长子刘荣，按照当时的继承法，汉景帝在公元前153年4月，立刘荣为太子，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栗太子。第二个人物是排行第九的刘彘，公元前153年时，他只有4岁，汉景帝封他为胶东王。刘彘从小就聪明过人，活泼好动，后来在争夺太子身份的时候获胜。汉景帝因为他聪明过人，替他改名为刘彻，这就是后来的汉武帝。第三个人物是汉景帝的亲弟弟刘武，当时刘武被封为梁孝王。按理说，刘武本没有理由立为太子，可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特别偏爱刘武，因此刘武也成为争夺太子地位的有力的竞争者。窦太后之所以极其喜爱刘武是有原因的。当时，窦太后是有名的保守派，她极端崇尚黄老思想，极端厌恶儒家思想。而刘武呢？从小在窦太后的身边长大，在思想倾向上和窦太后非常一致，因此，窦太后极力支持刘武，恨不得刘武马上登上王位，继续维持黄老思想的统治地位。

但是，窦太后要想立刘武为太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已经形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坚决反对立刘武为太子。窦太后的亲戚窦婴，就非常喜爱儒家思想，当时，他是太子刘荣的老师之

儒家对窦太后立刘武为太子的企图，始终给予抵制。在汉景帝立刘荣为太子之前，在一次宴会上，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宴会中间，汉景帝对刘武说：“在我死后，我想把天下传给你。你看怎么样？”刘武赶忙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连声说：“不敢，不敢”。但在内心深处，他可是对此求之不得的。坐在他一边的窦太后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不禁心花怒放。可是，正在窦太后得意之时，窦婴却不顾一切地站起来说：“陛下，请您三思而行。天乃是先辈们的天下，按照祖宗们的定规是父亲传给儿子，从没有哥哥传给弟弟之说。陛下您怎么可以把王位传给梁孝王刘武呢！请陛下三思而后行。”就这样，窦婴坏了窦太后的好事，从此以后，窦太后对窦婴就怀恨在心。

后来，汉景帝没有立刘武为太子，而是立刘荣为太子。这对窦太后等顽固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窦婴也成了太子刘荣的师傅，到此，窦太后是再也无法容忍了。她和长公主等人勾结在一起，用诡计激怒了汉景帝，在这种情况下，汉景帝不顾太傅窦婴、太尉周亚夫等人的反对，废太子刘荣，把他贬为临江王。

太子刘荣被废不久，窦太后就积极活动起来，她公开向汉景帝提出要求，让他立刘武为太子。结果，遭到许多大臣的坚决反对，汉景帝始终未敢立刘武为太子。而刘武自己也积极活动，上书试探汉景帝，要求给他升官，结果，同样遭到众大臣的反对，刘武不得不放弃努力。

面对儒家的积极进攻，窦太后知道不能坐以待毙，只能给予坚决的还击。于是，她召来《诗经》专家辕固生，向他请教应该怎么办。结果呢？辕固生是儒家思想的坚定信奉者，根本瞧不起黄老思想，辕固生当着窦太后的面大

骂黄老思想是“妇人之见”。用来治天下，根本行不通。辕固生当着和尚骂秃子，窦太后不禁怒火中烧，气极败坏。窦太后把辕固生大骂一顾，说他的儒家思想是从猪圈里学来的。然后，窦太后不怀好意地罚辕固生到兽圈里去打野猪。

而汉景帝呢？虽然对窦太后的决定不敢说一个“不”字，但是还是尽力想办法帮助辕固生。他特意为辕固生选了一把快刀。辕固生进入兽圈之后，拼命搏斗，最后一刀刺中猪心，才算保全了性命。

经过这一次斗争，保守派和改革派都发现，要战胜对方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好彼此妥协。儒家的信奉者们认识到：窦太后专横跋扈，手段残忍，一味蛮干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次辕固生太岁头上动土，差点把命搭进去就是一个明证。而窦太后呢？她也知道：儒家的势力也相当强大，如果对他们一味实行压制政策，他们势必要拼命挣扎，弄不好就会两败俱伤，谁也捞不到好处。最后，双方都做出了让步，立刘彻为皇太子。

至此，立太子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立刘彻为太子，窦太后并不满意。可是苦于儒家思想信奉者的激烈反对，窦太后也没有什么好的主意。窦太后心里认为，刘彻年纪还小，思想还没有定型，还有教育的余地。因此，窦太后仍把坚持黄老思想的希望寄托在了皇太子刘彻的身上。

但是，窦太后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皇太子刘彻所受的教育是相当复杂的。虽然汉景帝喜好黄老思想，但汉景帝对法家的思想也相当崇拜，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皇太子刘彻。更重要的是，汉景帝为皇太子刘彻物色的教师侍从中，有很多就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其中有一名侍从名叫卫绾，卫绾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奉者，后来成为“独尊儒术”政策的有力执行者。这是窦太后没有料到的。后来，卫绾升任御史大夫，又把信奉儒家思想的王臧任命为太子刘彻的师傅。这样，儒家思想就可以直接影响皇太子刘彻了。

随着皇太子刘彻年龄的增长，他所受到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在增长。在争夺皇太子的战役中，可以这样说，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最终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们把皇太子教育成了一位儒家思想的信奉者。

公元前141年正月，朝廷为皇太子刘彻举行了皇太子加冠礼。不久，汉景帝就病死宫中。这样，皇太子刘彻便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王位。这就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刘彻继承王位的时候，正是西汉“文景之治”之后的一个富足安定的社会。刘彻是幸运的，因为他父亲给他留下的是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社会。

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建设发展，西汉王朝已经培养出许多有才华有思想的人物，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呼唤着一位历史巨人的出现。刘彻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到他继位时，他已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青年了。汉武帝年轻力壮，兴趣广泛。天性积极进取，这正好和历史的要求一致。于是，汉武帝从内心深处渴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建立千秋帝业。

可是，要建立千秋功业，势必要求人们积极进取，而黄老思想则是一种保守的思想，汉武帝根本不想遵循它。汉武帝需要的是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

因此，到汉武帝时，儒家获得统治地位的各项条件都已成熟了。因此，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们纷纷行动起来，为争取儒家思想早日获得统治地位而努力。

其实撇开各种历史条件不论，就从儒家思想自身来看，儒家思想也具有

黄老思想所不具有的优越性。儒家思想以中庸为本，反对极端做法，同时吸取了黄老思想的某些合理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对于维持国家安定和政权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秦末农民起义时，就有许多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投奔到陈胜、吴广的起义军中，当时陈胜就说：“这些人在和平时可以用来治理天下，但在战争时期，却没有多大作用。”陈胜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些人不善于打仗。而现在的汉武帝呢？他认为儒家思想是使国家太平的良药，而且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的思想也很合汉武帝的口味。因此，汉武帝决定重用信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

首先，汉武帝组织了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的宫廷和军政领导层。这样，不管是朝廷，还是军队都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天下。汉武帝任用他的老师卫绾当宰相。卫绾被免除宰相职务之后，新一任宰相是赫赫有名的儒家人物窦婴。窦婴当宰相以后，更是大刀阔斧地改革，任用众多儒者担任朝廷要职。他先是起用儒家知识分子田汾为太尉，又力荐儒家知识分子赵绾为御史大夫。另外，窦婴和田汾两人共同推荐儒者王臧任郎中令。至此，朝廷的许多关键官职都由儒家知识分子担任了。

可以这么说，因为汉武帝的支持，黄老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斗争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支持儒家的汉武帝，让众多的儒家知识分子当官，很多人官至公卿。从西汉初年就一直受压抑的儒家思想，到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众多的儒家知识分子都大受鼓舞，野心勃勃，想建功立业。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汉武帝虽然能够对领导班子进行彻底的改组，但却没能从理论上解决政治指导思想这一问题。汉武帝深深为这一问题而苦恼，有时候，汉武帝将自己的苦恼迁怒于众儒者，说他们徒有虚名，根本成不了大事。众儒者也毫无办法，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汉武帝左思右想，始终未能解决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历朝历代都由盛到衰，最后灭亡。治理天下的真理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建立起千秋功业？汉武帝不愧为一代雄主，他决定向全国颁布诏书，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录用各种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有没有官职，不论他们出身如何，只要他们有真才实学，都可在朝廷任职，担任皇帝的顾问。

不久，汉武帝怀着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郑重诏示丞相、御史、列侯等高级官员，希望他们大力举荐全国各地的有才学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到朝廷接受皇帝的询问。这些高级官员听后非常高兴，纷纷举荐自己所赏识崇敬的人物，众人很快就从全国各地推荐了100多名优秀的知识分子，各种思想的人都有，但是儒家知识分子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有一位代表人物，他的名字叫董仲舒。

董仲舒是当时的一位儒学大师，他从小学习就非常勤奋，有时看书看得入迷，常常看到天亮前才匆匆休息一会儿，董仲舒天赋极好，再加上他的勤奋好学，使他成为西汉建国以来第一位有系统思想体系的思想家。董仲舒成年以后发奋著书，因为写了《公羊春秋》而名声大震。董仲舒为人特别严谨，言谈举止，非常有分寸，在和人交往时，特别讲求礼节。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曾经拜他为师，跟董仲舒学习《春秋》，很自然地，因为董仲舒的才能和声誉，董仲舒成为西汉儒家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汉武帝召见董仲舒以后，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董仲舒一一做了回答。汉武帝听后，十分赞赏。后来，汉武帝便重用董仲舒，并且接受了董仲舒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在众多的儒家知识分子中，董仲舒是当时最优秀的一位。当汉武帝下诏询问治国的指导思想时，董仲舒抓住机会，连续三次向汉武帝上书。在上书上，董仲舒阐述了为西汉王朝统治辩护的哲学思想。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的概念。这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出发点。董仲舒非常明白，要想让老百姓安于统治，必须让汉武帝的皇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皇权说成是上天的意志。因为，当时的老百姓是比较迷信的，董仲舒抓住这一点，从哲学的高度论证皇帝的权力是从上天那儿继承下来的。这就是说，汉武帝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是因为他顺应了上天的意志，是“替天行道”。因此，老百姓应该老老实实地接受汉武帝的统治，而不能有不安分的想法。否则，就是违反天命，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董仲舒思想的第二点，是指导国家的思想理论，来源于《春秋》。他认为《春秋》记载着上天和人的关系，上天和人有一种感应关系。如果皇帝和老百姓所做的事情符合上天的意志，世间就会发生许多吉祥的征兆；如果皇帝和百姓所做的事不符合上天的意志，上天就会惩罚他们，世间就会发生许多灾祸和奇异的事情。这是上天给人们的警告和惩罚。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从这一点出发，董仲舒认为如果发生了灾异的事情，作为皇帝就应该反省自己，检查一下现在实行的治国政策是否正确。从本质上说，董仲舒想从这一方面来限制皇帝的权利，防止皇帝权利的无限膨胀。当然，他的这个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后来的汉武帝对这一做法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董仲舒思想的第三点，是“人心”、“民心”的概念。董仲舒认为人心的归顺才是最现实的标准，上天的意志是通过“人心”、“民心”表现出来的。因此，皇帝也必须尊重“民心”、“人心”。

总之，董仲舒为汉武帝设计和描绘了一幅天人合一、君民融洽的社会均衡图景和统治方法，把汉武帝的理想神圣化，理想化了。因此，汉武帝对董仲舒的上书非常满意，对董仲舒委以重任。当然，汉武帝对董仲舒思想中有损皇帝权威的那一部分是坚决反对的。

董仲舒受到汉武帝的重用后，便急着把儒家思想抬高到国家统治思想的地位上去。因此，董仲舒便向汉武帝进谏说：“陛下知道全国上下为什么有不安定的迹象吗？出现这种混乱局面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结果，大家各说各的理，没有一个人相信别人的话是对的。这样，大家便争论不休，相互不服气，时间久了，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汉武帝觉得董仲舒说得很有道理，忙问应该怎么办。董仲舒说：“现在国家统一了，思想也应该统一。应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思想统一了，国家就会长治久安了。”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没有马上同意，他认为这样做还太早。但是，丞相卫绾这时也乘机进言，劝说汉武帝应该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行之有效的。最后，汉武帝经过再三考虑，终于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汉武帝重用董仲舒，董仲舒一时成为朝廷上下的大红人。“独尊儒术”措施的实行，使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但是儒家思想却给中国带了一系列难题。

公元前135年的2月和4月，西汉的宫殿和庙堂相继发生火灾。董仲舒

听说以后，马上写了《灾异论》这篇文章，说这是上天给汉武帝的警告，汉武帝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董仲舒还没打算交给汉武帝时，有人偷着把文章交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把文章交给人们讨论。结果，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为了迎合汉武帝，说这篇文章全是胡言乱语。吕步舒没想到他的话把老师送上了绝路。汉武帝把董仲舒判为死罪，关进了监狱。后来，汉武帝下诏免了董仲舒的罪，但董仲舒再也不敢发表议论了。

总之，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形势下，儒家试图用天意来限制至高无上的君权，然而他们却都失败了，董仲舒这次失败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儒家给皇权套上了神圣的光圈，却找不出限制皇权的办法。从此以后，中国皇权不断得到加强，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而儒家呢？面对这种形势，却不能劝君王实行改良，每当社会陷于危机，都不得不依靠战争来解决。

